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4月30日第89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孙言诚 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
——兼评《王力反思录》、《戚本禹回忆录》

生逢乱世

张 比 “红八月”冤魂陈彦荣一家三代的命运
谢声显 空向青山问逝川——我所知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钟裕华

研余杂记

何 蜀 莫将记忆付秋风——记重庆地区147位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工作
附录1 参加口述录制的文革亲历者名单
附录2 原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口述者当年职业身份分类

本刊特稿

徐小青 塔园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兴亡史略

【热点研究】

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 ——兼评《王力反思录》、《戚本禹回忆录》

孙言诚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年被中共中央和两报一刊吹捧到天上的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红八月”，于今已是尽人皆知的一场对政治贱民的血腥屠杀。不少学者把它比作纳粹时代的

“水晶之夜”。其实，它比“水晶之夜”要恐怖得多，也残忍得多。“水晶之夜”总共打死 91 人，而“红八月”打死的，仅官方公布的数字便达 1772 人。至于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酷、冷血，更是纳粹冲锋队所望尘莫及的。

是谁制造了这场屠杀？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笔讳莫如深的糊涂账。

“水晶之夜”的罪责是清楚的。街头烧杀的冲锋队员固然有罪，但罪魁祸首却是纳粹党及其党魁希特勒、戈培尔、海德里希。“红八月”呢？到目前为止，承担罪责的只有抽象的“红卫兵”。近年来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公开作了真诚的反思和道歉，但多数是没打人、甚至还制止打人的，只有极个别是打过人的，当场打死人的则一个也没有。根据当时打死人的凶手往往多于被打死者的人数来推算，打死 1772 人，凶手应有几千人。这几千人是彻底在历史上消失了。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当年领导红卫兵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在他们的《反思录》、《回忆录》中，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坚决反对红卫兵“破四旧”、打人。不仅他俩反对，据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甚至谢富治，都坚决反对打人、杀人。在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几千凶手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多日而不是像“水晶之夜”那样一个夜晚，而且杀死了一千多人，这不是嘲弄十几亿国民的智商吗？

本文拟从分析王力、戚本禹的回忆入手，揭示“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形成过程，探明这场大屠杀的真正责任人。

王力如此“反思”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这样说：

“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做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

“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类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

“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¹

按照王力的说法，从红卫兵走上街头，他就不赞成“破四旧”。毛泽东也不赞成，林彪、陈伯达也没号召，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鼓动红卫兵干

¹ 《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一版。第 644 页。

的，罪魁祸首是主管宣传的陶铸。这个谎编得实在离谱。

“破四旧”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来的。“十六条”的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四旧”。它说：

“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即“破四旧”。

“十六条”据王力讲是毛泽东要陈伯达搞的，陈伯达找了王力、关锋等人在钓鱼台十四楼着手起草。言下之意，陈伯达和王力是主要起草人。对此，戚本禹还因为没提到他而颇为不满，说起草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1

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制定并经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号召“破四旧”，而参加起草的王力，三十年之后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不同意“破四旧”，这不是公然撒谎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依据的就是“十六条”。他们先是剪裤管、改路名、砸招牌，很快便发展成抄家、打人、打死人。他们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无人敢管，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十六条”作依据。

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和走向社会，是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大会之后。接见前，红卫兵只是个别中学的学生组织，活动也限于校内。接见后，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并迅速冲向社会。那次接见，毛泽东戴上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名声一下子便如日中天。毛泽东又问了宋彬彬的名字，鼓励说：“要武嘛！”表面上看，“要武”只是对名字中“彬彬”二字的调侃，实际上，毛是在用“十六条”教导红卫兵。“十六条”第四条提出：“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段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话，下文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整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红八月”的暴烈行动，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王力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是“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仿佛毛泽东不知道红卫兵在杀人。这又是弥天谎言。8月是文革再发动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革进程，连细节也不放过，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8月20日，林彪向毛泽东转送了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

¹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命简报》。他显然是对红卫兵的暴行感到不安，想提请毛泽东注意。不料，毛泽东在转送文件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¹我们无从得知那份简报的内容，但从批语来看，决不会是剪裤管之类。那种小事，林彪是不会转送的。简报反映的很可能就是抄家、打死人的事。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回忆录中也记下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态度：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²

这段回忆把三个人对待“破四旧”的态度，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作为市委书记，吴德深感承担不起这场屠杀的历史责任，所以他决心说服毛泽东结束“混乱局面”。所谓“混乱局面”，指的就是血腥屠杀。他想不到他的“期望落空”。他用“雄才大略”、“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来形容毛泽东的回答，其实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也是要向后人厘清这场屠杀的责任。



（上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左1〕、江青〔右1〕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狂热的红卫兵在一起，向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

¹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38页。

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7页。

林彪明显也不赞成打死人。他先用“这是个伟大的运动”抽象肯定“破四旧”，但话锋一转，他说“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联系前边的转送简报，他其实是在规劝。他的话和当年刘少奇说的“饿死人是要上书的”，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说法更婉转而已。

只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对这场屠杀毫不介意。他对吴德汇报的回答是：“破四旧”动了几代遗老，“这样也好”。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革命思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何况，只是打死几个遗老！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破四旧”中放纵红卫兵虐杀“黑五类”所造成的恐怖景象，正是毛泽东震慑“反革命派”的重要手段。

王力自诩是在和毛泽东接触中了解到毛对“破四旧”的态度的，但他既没讲具体时间，也没讲毛泽东是如何表述的，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无从判断。而林彪和吴德跟毛泽东的接触，都是在“破四旧”进行之中，他们所反映的毛对“破四旧”的态度，清晰而又明确，决非王力的谎言所能否定得了的。

王力把“破四旧”的罪责推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在“破四旧”中，官方舆论确实起了煽风点火、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但那绝不是“具体工作人员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指使他们这样做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解放军报》代总编）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领导，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¹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从8月26日到9月1日，是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据王友琴统计，26日打死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8月29日正是高潮的顶峰。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

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52页。

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又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分明是为大屠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可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撰写的社论。有学者说，撰写、修改该社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知王力是否参与其中。不管是谁撰写的，该社论是奉旨行事殆无可疑。

文革结束后，“红八月”的残酷真相陆续曝光，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忍，惊世骇俗。王力为洗白自己，罔顾事实，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反对“破四旧”。这既表现了他推脱罪责的无耻，也流露出他对深重罪孽的恐惧。他说是毛泽东，其实正是他自己“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

戚本禹机关算尽

王力“反思”问世十五年之后，《戚本禹回忆录》出版了。和王力一样，戚本禹也竭力洗刷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罪恶。那罪恶毕竟太大，责任人谁都想切割。最好的切割办法就是把罪责推给别人。王力推给了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戚本禹则推给了叶剑英、万里和首都工作组。

和王力不同，戚本禹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罗列“事实”，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在《后记》中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果然，2017年1月《红色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被称作“中右”人士的东夫写的文章《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副题是“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文章说，读了戚本禹讲述的查抄东风市场、写报告阻止大兴屠杀的事实，才知道原来“破四旧”是叶剑英和万里搞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说法的荒唐。但戚本禹的“事实”，确实迷惑了相当多的人。到文革一代逐渐故去之后，戚本禹描述的“事实”说不定真就成了“信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几个小题目，看一下戚本禹的观点和他回忆所涉及到的具体事实。

（一）红卫兵和破四旧

戚本禹说：“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¹

他首先把红卫兵和“破四旧”作了一个切割。按照他的说法，把红卫兵和“破

¹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四旧”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是否定文革的人的别有用心。但是“破四旧”毕竟是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没有红卫兵就没有“破四旧”，直接切割于理不通，所以戚本禹用了一句含糊的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复杂就复杂在“破四旧”上。前面说过，红卫兵敢于肆无忌惮地“破四旧”，就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对此，戚本禹并不否认。他说：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¹

既然“破四旧”的活动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么“破四旧”的罪责理应由中央文革承担。但是，戚本禹话锋一转，轻轻的一句话，就把责任推掉了。他说，虽然“破四旧”是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的非法行动。”是什么权势人物呢？“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²

在这里，戚本禹又进行了一次切割——一切割“破四旧”。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破四旧”本来是革命行动，后来在叶剑英唆使下才演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非法行动。因此，打死人的责任应该由叶剑英和王任重承担。（按：王任重和首都工作组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和江青有矛盾，戚本禹就把他也拉上了。）这种切割，只能骗骗没经历文革的年轻人。

（下图：毛泽东在审定林彪将要代表中央宣读的支持红卫兵的讲话稿。）



红卫兵走上街头是8月19日，当天就打死了人。8月24日打死人的数目上升为两位数，26日上升为三位数，9月1日打死人的高潮结束。前后不过十二天，何来演变？在这十二天中，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人民日报》狂热地吹捧红卫兵，从未间断，吹捧

的内容正是他们的抄家、打人。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检阅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

¹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²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作最后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¹

当然，叶剑英、王任重也吹捧红卫兵“破四旧”。那段时间。举国上下无人敢不吹捧，就连最敢讲话的陈老总，也说：“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²大家吹捧，是因为都在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脸色行事。现在始作俑者不承担责任，却拉追随者垫背。戚本禹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了对红卫兵“破四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可是却一点不反思自己的罪孽，还用垫背者来洗清自己，手段未免低下。

（二）关于首都工作组

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叶剑英，主要根据就是首都工作组主持了“红八月”的遣返。他说：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

“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管，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³

首都工作组确实实施过一次遣返，但不是在“红八月”，而是在它刚成立的1966年5月。周恩来在1967年1月曾对此事作过说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有些不稳定的人也调一调。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但又担心扩大，有点踌躇。请示主席，主席指示，除个别劳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矛盾下放。”

“六月十日我请示过主席，六月十三日回来，传达主席指示，这个工作就停了。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⁴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118页

² 《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1966、08、30，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³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5页。

⁴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这次遣返和“红八月”红卫兵的遣返是两回事，它根本不是由“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出面执行的，那个时候中学生还在上课呢。据张民讲：“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¹具体遣返了哪些人，由于看不到档案材料，不得而知。

戚本禹把首都工作组5月实施的遣返挪到8月来，目的就是洗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纵容红卫兵的罪责。他以为把事情推给首都工作组，罪责就可以让叶剑英承担了，因为叶是首都工作组的组长。其实首都工作组所做的一切事，第一要负责的是毛泽东，其次是周恩来，叶剑英不过是具体执行者。关于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周恩来在1967年讲过：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得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²

原来因为毛泽东感觉北京不安全，不敢回来，所以指示林彪解决这个问题。林彪提议成立北京工作组，于是周恩来着手筹备，然后再由毛泽东批准，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由毛、林、周共同策划的神秘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事无巨细均由毛泽东拍板的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机构。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首都工作组，以为这样毛泽东就洗白了，结果恐怕适得其反。5月指示首都工作组遣返和8月纵容红卫兵遣返，主意都是毛泽东定的。

（三）查抄东风市场

查抄东风市场是戚本禹所谓反对红卫兵打人的铁证，《回忆录》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戚本禹讲，红卫兵走上街头乱打、滥杀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³于是就有了查抄东风市场的精彩一幕。

笔者曾面对面听戚本禹讲过这段经历，有些细节比《回忆录》所写还要血腥。用不着怀疑这段史实的真实，那种血淋淋的场面，非亲历者编不出来。但是这件事绝对不是发生在“红八月”，而是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之后，

¹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100页。

²《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³《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2页。

即 66 年的 11 月下旬。

关于这份通告的出笼，吴德曾经这样讲：

“那时（是）武斗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了。10 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 11 月 18 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¹

戚本禹正是根据这个通告才去查封的东风市场。陈伯达取缔六中劳改所也是这个时候，《陈伯达遗稿》同样用这事说明自己反对打人。殊不知 9 月 6 日陈伯达还去六中支持红卫兵，那时六中劳改所已经打死人了，陈走后，六中红卫兵又打死学生王光华。

吴德的回忆是真实的，直到 10 月份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维护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不准压制红卫兵的决策，连一份制止打死人的通告都不准发布，怎么可能在“红八月”开会研究红卫兵打人问题，还派戚本禹去查抄东风市场呢？戚本禹说是周恩来派他去的，我们不妨看看文革中周的讲话：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²

这是 9 月 25 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的讲话，目的是婉劝红卫兵不要设点打人。直到 9 月下旬，周荣鑫和雍文涛都对东风市场的打人据点束手无策，周恩来的规劝也透着苦涩和无奈。如果“红八月”周恩来就派戚本禹

¹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一版。，第 28 页。

²《九月二十五日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讲话》，载联合编辑组编《首长讲话选编》，1967 年 3 月，第 156 页。

抄了东风市场，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戚本禹说，红卫兵乱打滥杀的情况，是记者反映给中央文革的。“红八月”之后，确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采访过东风市场，他在叙述了目睹的惨状后，说：

“回到报社，对东安市场（按：文革中改名东风市场）红卫兵发生的过火行为，我连夜写出情况反映送往中央文革。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就传来，要记者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专门宣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语录。”¹

这才是中央文革在“红八月”中的真实态度！诚如戚本禹所说，他们完全知道红卫兵的乱打滥杀，他们不缺乏了解情况的渠道。但是，在毛泽东不准压制红卫兵的指示下，在中央出台《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形势下，他们不会也不敢开会研究制止红卫兵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他们不仅自己不制止，还坚决反对别人去制止。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解放军报》记者的采访反映，都是例证。类似的事还有不少。直到9月2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要求红卫兵不要打人，拘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讨论的时候，中央文革的人还坚决反对，致使该意见胎死腹中。

或以为戚本禹毕竟查抄了东风市场，这不也能证明中央文革反对老红卫兵的乱打、滥杀吗？笔者拟借用戚本禹的一句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查抄是11月下旬，也就是冬天进行的。1966年的冬天和夏天，那可是乾坤大转移。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了。”²这部分人就是夏天“破四旧”、冬天“刮黑风”的老红卫兵。夏天，他们在学校里造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殴打校长、老师，打死人；冲上街头“破四旧”，抄家、批斗，打死“黑五类”；革命豪情高万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百般呵护、怂恿、支持。冬天，他们保爹、保妈、保工作组，上街贴大字报，刮“黑风”炮打中央文革，变成了“反革命”，招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严厉镇压，部分老兵甚至被关进监狱。东风市场打人打了三个多月，为什么没人敢管？11月下旬，中央文革为什么又查抄了它？道理就在于此。戚本禹把他冬天镇压老红卫兵的事搬到“红八月”来，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夏天的罪行，心机虽深，但骗不了从文革走过来的人。

¹李景荣《狂热·幻灭——红卫兵运动剪影》，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9页。

²《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第1961——1968年卷，第290页。

其实，王力也好，戚本禹也好，一直到关进秦城监狱，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歌颂。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记录红卫兵“破四旧”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竟然是会议文件之一。也是在那个时候，林彪指示办《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筹办工作。1967年春末夏初，筹办就绪，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陈伯达带领下到展览馆接见工作人员。据当事人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¹不知道那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戚本禹是否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认为“破四旧”是“随意抄家、打人、打死人”的非人道行为？这个展览办了两年，一直到1969年初才结束。到那时为止，社会上一直无人敢对“破四旧”说半个不字，而王力、戚本禹其时已经在秦城监狱了。

（四）. 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屠杀“黑五类”，是“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巅峰。谈“破四旧”，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笔者曾和戚本禹交往一年多，关于文革的经历，他曾系统地对笔者谈过。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最关心的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大兴“八三一”事件。前者他向笔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而后者，除了说他曾经到大兴之外，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在《回忆录》中，戚本禹却把自己描写成大兴事件的亲历者和终结者。他这样说：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

经过调查了解，加上时任大兴团委书记的康生孙女的帮助，他俩终于弄清了情况，然后——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²于是，大兴的屠杀停止了。

故事编得很好，可惜不是事实。他没说他和王力是哪一天去的大兴，但马力去大兴是9月1日清晨，按戚本禹所述推算，他和王力去大兴理应是8月31日。8月31日是大兴屠杀最疯狂的一夜，亲历者有具体描述：

“我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

¹丁大华《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一期。

²《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4页。

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等 10 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

“9 月 1 日凌晨 1 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个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乞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又进一步与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嘴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¹

张益三是和马力一起被市委派去大兴的（不是戚本禹打电话叫去的）。此事，吴德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人……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²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³

8 月 31 日的夜晚，大兴县的恐怖气氛远非“水晶之夜”可比。村内杀人，村外布岗，严禁出入。县委书记带十几个人、市委派卫戍区政委去，都进不了杀人现场。他们不断地冲锋，直到 9 月 1 日的黄昏时分，才冲至第三道防线，王根亢厉声吼叫：“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站岗的民兵经过请示，这才放他们进去。现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而戚本禹说他和王力一到大兴，“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尤其荒唐的是，戚本禹还说他为制止大兴屠杀打过报告：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

“我们的报告是 1966 年 8 月 26 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 8 月 28 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

“8 月 29 日下午，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们）特别谈了在大兴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

¹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 年 9 月第一版，第 399 页。

²禹作敏：80 年代天津大邱庄的庄主。庄内曾私自打死人，并拘禁办案人员。天津公安局动用 400 名武警封锁大邱庄，村民和工人持棍棒、钢管与武警对峙。1993 年禹作敏被捕，判刑 20 年。

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一版，第 38 页。

不吭。”¹

故事编得有声有色，时间逐日排列，毛、周、谢的讲话口吻逼真，不得不令人叹服。可惜故事有悖常理。大兴县杀人是8月27日开始的，戚本禹居然在26日写出了报告。中央29日研究了大兴的问题，大兴县却在31日大规模杀人。离奇的是，戚本禹、王力那晚还赶到大兴把杀人者吓跑了。

难道说是戚本禹记错了日子？不是。因为戚本禹和关锋确曾在8月26日给毛打过一个报告，毛批了，而且专门于29日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了该报告。此事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上有记载。29日的常委扩大会，在逢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上也有记述。但那报告肯定不是关于大兴屠杀的，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始屠杀。戚本禹为了证明确实写过关于大兴屠杀的报告，就把这个报告拉来顶差。殊不知他并不清楚大兴屠杀的来龙去脉，本想移花接木，反而弄巧成拙。

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的经过，笔者在《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一文中曾有论述。²事件起因于榄杆市事件。8月25日，小房产主李文波砍伤了抄他家的女红卫兵。在举国上下视红卫兵为天兵天将的时候，李文波的行为无疑大逆不道。尽管他被当场打死，事情却并未了结。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周恩来、谢富治立即发表公开讲话，把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尤为出格，他竟然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于是整个北京市刮起了复仇的旋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说：“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³红卫兵由打“黑五类”，发展到打狗崽子，“破四旧”每天打死人的数目由两位数跳升到三位数。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⁴

这次恶性屠杀事件，起因于爱护、支持红卫兵，直接导火索则是周恩来、谢富治的讲话。据《北京日报》社1985年2月编的《宣传手册》讲，大兴县公安局8月26日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各派出所纷纷行动，27日就展开了屠杀。“有的人造谣说：这事（指杀人）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⁵

¹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6页。

² 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³ 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

⁴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98页。

⁵ 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戚本禹显然也知道一些内情，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撇清周恩来和谢富治的责任，却把罪名按在万里的头上。他说“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明明是县公安局会议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戚本禹却说是万里的指示。明明是派出所利用基干民兵联手村干部杀人，戚本禹却说“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如此信口雌黄，目的只有一个：洗清有罪的“左派”，把污水泼在主张改革的叶剑英、万里身上。

红卫兵如何走上杀人道路

王力、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反对“破四旧”，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破四旧”所针对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文革斗争的大方向，而他们是始终把握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的。“破四旧”是走资派为转移斗争方向挑动、引导红卫兵去搞的，王力点了陶铸的名，戚本禹则举出叶剑英、万里。

走资派，或者说一切当权派，当然欢迎“破四旧”。在“炮打司令部”的形势下，当权派人人恐慌，巴不得把祸水引向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在地方上表现尤其明显。各省的方面大员，接过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旗帜，纷纷组织官办红卫兵，让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典型的如西南局的李井泉、中南局的王任重、西北局的刘澜涛、湖南的张平化、上海的曹荻秋、杨西光……一段时间里“捉黑鬼”、“斗鬼风”甚嚣尘上。偏远如青海，王昭也把佛教大师喜饶嘉措拉出来，鼓励红卫兵去破他的四旧。

但是，北京的“破四旧”却不能用这个理论去套，因为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支持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正确。北京红卫兵打死人，不始自“破四旧”，而始自中学生斗黑帮。第一个打死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此后不断有学校领导和教师死于“左派”学生、红卫兵之手。是几十名、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的牺牲，刺激起红卫兵运动的恐怖狂潮。有个北京红卫兵这样描述他们当年的经历：

“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¹

“破四旧”打死“黑五类”，不过是打死教育工作者的延伸。到8月下旬，二者合流又互相激励，遂愈演愈烈。校长老师都敢打死，地富反坏右又岂在话下。余英时曾提出，“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间断过。”“为什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他认为这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其实，这问题说大很大，说简单也简单，红卫兵不过

¹高宜《最黑暗的夜晚》，载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5页第一版。

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文革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斥教育界，有些话说得很严重。例如：

“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¹

“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²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³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⁴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⁵

只要读读这些讲话，红卫兵对师长们痛下黑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是身边的校长和老师，这对那些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而又急于当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女们意味着什么？请看两位干部子女的对话：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中学生的会。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青少年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⁶

这批杀气腾腾的干部子女如何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倒真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

¹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1961--1968年卷，第220页。

²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1965年8月8日）同上第314页。

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同上第335页。

⁴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华东）同上第332页。

⁵ 《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

⁶ 叶维丽《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10页。

题。巴金说：“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不谈长期的狼奶教育，单就“红八月”看，“孩子们”杀人也不是一夜之间练成的，他们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8月初，即文革再发动之始。高潮的推手是撤销工作组。

早在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干子弟，从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知道了毛对教育战线的不满，他们遵从“学校应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的教导，以不贯彻阶级路线为名攻击学校领导，是为“四、六、八学潮”。学潮被北京市委化解。

1966年6月，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组织红卫兵，仍以相同理由造学校领导的反，他们遭到工作组的抵制。

两次学潮，都是遵从毛的讲话闹教育革命，文革发动，他们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北京市委、刘邓工作组站在他们对立面，自然就是反动路线。其实，工作组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搞教育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校长和老师。不同的是斗争方式，一个要放手发动群众，让学生大闹天宫，一个则想用传统搞运动的方式。7月29日，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又撤销了禁止乱斗的1966年310号文件，学生们彻底获得了解放。

很快，把阶级路线推向极致的“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其实是高干子女）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开始动手了。8月4日，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用皮带抽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座的中央文革大员无一人出面阻止。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点名赞扬了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这无异于给造反学生的野蛮行为火上浇油。

从此，中学生放开手脚批斗黑帮了。典型案例如四中和八中的游斗，师大女附中的“八四”殴打校领导和“八五”游斗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其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层斗争惊心动魄，谁也不敢管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卞仲耘被打当晚回家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胡志涛去了西城区委，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区委根本不管。回到家，她丈夫说：“怎么打成这样？”她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第二天早上，她去北京市委求救，市委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她们不敢不回学校，结果那天胡志涛惨遭毒打，卞仲耘被打死。

笔者赞成叶维丽的看法：“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威慑作用，具有其他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

第二次高潮是8月中旬到8月25日前。标志性事件是8月13日的批斗小流氓大会和8月19日的批斗黑帮分子大会。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师生，

则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批斗小流氓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的。由于在会上残酷殴打批斗对象，对中学生震动很大。请看两个中学生的回忆：

“那次在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惊……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¹

“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刀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座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²等没一人制止。”³

批斗会后各中学掀起打流氓的狂潮，红卫兵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抓进学校，严刑拷打，校园暴力增加了新内容，关押黑帮老师的劳改所、教育室扩大了收容队伍。这次是往死里打。人大附中因打死“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师大女附中打死周围饭店的一名女服务员。两名被打死者都不过 18 岁。各中学红卫兵打死流氓的事有所闻，这为几天之后冲上街头打地、富、反、坏、右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头。

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黑帮分子，是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彭真内弟、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四、六、八中的校领导陪斗。会上，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激昂，不断有红卫兵冲上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批斗对象。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拉回后台冲洗后再押回批斗。八中校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当场昏厥。

这次批斗会后，校园暴力急剧升级。当晚，北京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从 19 日开始连续被打三日三夜，于 22 日被打死。此后陆续被打死的有八中支部书记华锦、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白纸坊中学支部书记张冰洁、北师大附中教师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师杨俊、第十五女子中学支部书记梁光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有一个讲话：

“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⁴

¹叶维丽《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一版，第 107 页。

²有亲历者说周恩来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

³老鬼（当年第 47 中学学生马波）《血与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转引自《文革受难者》第 310 页。

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1961---1968 年卷，第 349 页。

已经打死那么多人了，毛泽东还认为乱得不厉害。“呼吁书”号召红卫兵不要打人，毛泽东却认为太文明了，是惊慌失措，对打流氓倒有些不以为然，对暴力批斗黑帮却不置一辞。这大约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吧。

第三次高潮是8月25日，也就是榄杆市事件之后。由于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复仇狂潮，大量的人被打死。新风霞在《绝唱》一书中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市“打全堂”的日子，她听到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最后，终于引发了昌平、大兴的大屠杀。

“红八月”的乱打人、打死人，是在一片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中公开进行的。据卞仲耘的家人回忆，他们去火化卞遗体的那天，城里到处红旗飘舞、锣鼓喧天，和他们的悲戚心情形成极大的反差。整个十年文革，“红八月”一直是革命的象征，是红卫兵引以自豪、官方媒体反复赞颂的“丰功伟绩”，谁胆敢否定“红八月”，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而王力、戚本禹却在几十年之后说他们当时就反对“破四旧”。当年他们的革命表演有目共睹，他们会在那个时候充当反革命？

不能否认，毛泽东、中央文革确实都说过不赞成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十六条”也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打死这么多人的事呢？问题出在，他们认为推动运动发展、实现革命目标远比打死人（何况是打死阶级敌人）重要得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出面阻止，反而鼓励红卫兵继续革命。他们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恐怖狂潮。

【生逢乱世】

“红八月”冤魂陈彦荣一家三代的命运

张 比

2015年1月6日，我到清华东区看望了分别57年的小学同班同学陈书祥。

1951年到1957年，我们在清华附小同学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101中学，他被保送上了清华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教师，我则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打听对方的消息，却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谈了许久。如今都年过古稀，执手话当年，不胜唏嘘。陈书祥的名字与“书香”谐音。是他那从农村出来到清华当锅炉工的爷爷为孙子起的名字，希望他读书成才，改变门风，1966年“红

八月”时，一些中学红卫兵，打死了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和许多无辜者，而后来并未受到追究，还一直佑护着他们成为“革命接班人”。我和陈书祥等劫后余生，幸存至今，对往事不堪回首，但仍然要在回忆中反思，以平民的身份，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历史的记忆。



陈书祥和他家族的故事，曾经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由历史学者王友琴做过调查，2014 年 12 月，共识网记者又对他有过访谈。在学者侯宇燕的帮助下，陈书祥写出了回忆录《记住爷爷，记住清华》。这次，我和他交谈，了解了有关他家族的更多事情。我们都和清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父亲 1934 年入清华读书，至今 80 年；他祖父则于 1917 年进清华当工人，快 100 年了。百年风雨，有过多少平淡如水或惊心动魄的故事……

（上图：老同学难得的聚会。左为张比，右为陈书祥。张从摄影。）

祖父陈仲芳的“书香梦”

陈书祥的祖父陈仲芳，出生于 1893 年，家境极为贫寒。原籍是河北省大兴县采育镇再城营村。1952 年全国行政区划时划为北京市，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再城营村。虽说是家中的独子，可没有念过一天书。家中没有土地可种，陈仲芳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职业是摇煤球。地点可能是现在的通州区马驹桥一带，或是大兴区青云店、安定一带，离家少则二三十里，多则五六十里，只能在夏种、秋收、春节时期回家，帮人家打短工，换些粮食。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汗没少出，累没少受，但家中依然是一贫如洗，只有两间半又低又矮的土坯房。无意中听工友们说，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招锅炉工。于是陈仲芳只身前往清华学堂。这一年是 1917 年，当时他 23 岁。

正是凭着年轻力壮、诚实、肯干，不惜力，在清华学堂立住了脚，不久还成为清华学堂的一名正式锅炉工，主要从事烧锅炉、抬煤、水暖安装维修等工作。

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陈仲芳一辈子辛辛苦苦，靠摇煤球、烧锅炉，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钱来，用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把老家住了几辈子的两间半土坯房翻建成砖房，仍无能力给房顶铺上瓦，只能用白灰加青灰再加麻刀和在一起

抹成灰顶房。此外，还购置了十几亩地和一辆有两个木轱辘的农用车。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清华大学被迫迁到云南的昆明，与兄弟院校合办西南联大。陈仲芳离开被敌寇占领的清华园，拒绝给日本人干活，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陈仲芳又应清华大学之邀，再次回清华大学工作，这一干又是九年。（下图：陈仲芳遗像。）



1955 年国家实行退休制度，陈仲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退休人员。至今陈书祥依然保留着由清华大学签发的退休证书。上面写着：“陈仲芳，男，系河北省大兴县人，现年六十一岁，为我校工程科技工，工作已达 29 年，因年老不宜工作，准其退休养老。特此证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就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有人性了。在民国时期，陈仲芳虽然一度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但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员回到北平后，依然顾念先前的老员工，把他们都重新招回来。而陈仲芳退休后，根据学校当时的政策，却要求退休人员把居住的住房腾退出来。陈仲芳当时住的是清华大学校内的职工宿舍，为清华大学工作了 29 年却要扫地出门，因此他非常生气，一开始不肯搬迁，但到了 1956 年春节，最终还是从清华大学搬出去了。搬家那天，他还当着清华大学房管科的工作人员狠狠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搬出去，我的儿子也不在清华大学工作了；又指着陈书祥说了第二句话：将来我的孙子会回来。

这样，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离清华大学不远的蓝旗营住下来，租别人的房子，当时的租金特别贵，每月要 12 块钱，几乎占去了退休金的三分之一。陈仲芳自认为身体很好（其实他患有高血压，高压有时达 180-200），又加之家中孙子女多，儿子的工作不稳定，经济压力太大，便又找到白石桥附近的国家气象局，重操旧业烧锅炉。但工作不到一年，就在 1956 年冬季的一天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工作岗位上。虽然清华大学、国家气象局出面多方救治，生命保住了，但从此患上了半身不遂。开始拄着拐棍还能遛遛，后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1959 年阴历正月初三，不幸逝世。三天后安葬在原籍陈家墓地里。

陈仲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过年一定會在门柜上贴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表达了他的美好愿望：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老实，好日子

才能过长远。他还时刻盼望着他的子孙，改变命运靠读书，只有脑子里有知识才能兴旺发达。1943年，他的大孙子出生，陈仲芳为孙子起名“书祥”，与“书香”谐音，为的是希望孙辈通过读书，改变家族命运。

父亲陈彦荣不幸成为血腥“红八月”的冤魂

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生于1929年，13岁的时候，经人撮合，娶了亲，女方比陈彦荣大4岁。第二年就生下了陈书祥，所以，父亲只比陈书祥大14岁。

陈彦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1952年，全家迁到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在清华大学做了锅炉工。

陈彦荣父亲退休后，他们全家被迫搬出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从清华大学退出，托人在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作。

1966年，陈彦荣只有37岁。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遇事不会转弯子，不会见风使舵和随机应变，只认死理。

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是周六。陈书祥有些不舒服，在学校的医务室检查了一下身体，所以回家比较晚。等到离家不远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位街坊女邻居在向他挥手，示意他快跑，他隐约看到一群红卫兵围着他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感到家里有事情发生，扭头就往学校的方向跑，进南门之后，又围着清华左绕右绕，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晃悠了几个小时。还是对家里的情况不放心，于是，到了晚上九点多，又偷偷地回到家里。这时他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被红卫兵带走了，家中的弟妹不知道他们把父亲母亲带去了哪里。

第二天上午，母亲回来了。她蓬头垢面，脸上血迹斑斑，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后背裸露着，背上伤痕累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她带回来噩耗，告诉孩子们父亲昨天晚上被那些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¹。她被放回来，是要筹集28块钱火葬费，红卫兵威胁她必须在当天下午之前把28块钱火葬费送过去。

陈书祥马上又回到学校，找到一位老师，借了28块钱，赶回家交给母亲，事实上，回到家的时候，红卫兵已经来过了，他们是专门来讨火葬费的。母亲从邻居那里借了28块钱，交给了红卫兵，他们拿着钱就走了。

8月29日，要收尸。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了一个证明，中午，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这个证明去找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路骑到北大附中的门口，只见北大附中的大门紧闭，附近的街道也几乎没有行人，死一般的寂静，门

¹ 对此事有另一说法：当时北大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牛皖平事后对人说过，打死陈彦荣的是清华园中学的红卫兵，当晚曾把陈彦荣拉到北大附中，牛得知后，要求他们把人从北大附中带走。29日牛回学校时也只看到一具女尸，是被北大附中学生打死的。

口有几个人在议论纷纷，说前天晚上这个学校打死了两个人，据说是一男一女，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陈书祥没敢进北大附中的门，又折返回来，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父亲的尸体、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并且，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陈书祥手上，至今还保留那张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具的证明材料。

据陈书祥母亲说，那天下午来的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他们将陈书祥的父亲、母亲一块捆绑起来，在成府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将二人扔在大卡车上，先是拉到清华园中学，把人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用军用皮带和塑料绳编成的麻花绳狠狠地抽打，最令人发指的是，到后来，他们干脆连军用皮带都不用了，直接用铁栅栏上的钢筋抽，打了一顿之后，这些红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开车把陈彦荣夫妇拉到了北大附中。陈书祥母亲甚至连什么时候被拉走的都不知道，到了北大附中，仍然把他们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又是一顿毒打。因为母亲年龄较大，又是女性，被打得轻一些，而陈彦荣不服气，顶撞了红卫兵，被打得特别狠，直到被打死。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

北大附中红卫兵为何要闯入工人家庭抓人并打人致死呢？据说是红卫兵听说陈书祥的爷爷当年积攒了数年的工资后在老家买了些土地，土改时在家里的奶奶就被定为“富农”成分。“破四旧”抄家时，街道派出所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红卫兵，于是到他家来搜查黄金。陈彦荣不服，以工人的身份与他们争执，被残忍地毒打致死。

当时陈家有八口人，父亲陈彦荣一死，生活顿时就陷入了困境，家里只有陈书祥一个人参加工作，一个月只有 37.5 元的工资，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家庭的，而弟弟妹妹都还小。清华附中核心组负责人事工作的韩志学老师几次三番地为陈书祥争取困难补助，在学校的会议上据理力争，说：不管他父亲如何，他的子女都要吃饭。最后，清华大学补助了陈家每个月 51.5 块钱的困难补助，这笔困难补助加上陈书祥的工资，八口人正好是人均 11 块钱，达到北京当时的最低人均生活标准，这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76 年以后，给陈彦荣的最后结论，说是“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致死”，而那些打死陈彦荣的北大附中红卫兵们，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人到陈家来过，更没有人向陈书祥的母亲和全家表示过任何的歉意，陈书祥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骨灰、遗体落在何处，仿佛从此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孙子陈书祥的艰难选择

陈书祥，1943 年 6 月生。1951 年 7 月被爷爷领进了清华园，同年 9 月 1 日

上清华附小。1957年7月被保送上清华附中初中。1960年7月又被保送上扩建后的清华附中高中。1963年7月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先后做过共青团、少先队辅导员、宿舍管理等工作，还担任过总务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学校中层领导职务。担任过年级组长、班主任。1993年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1996年被清华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02年10月退休之后又被学校返聘两年。至此，他在清华附小学习6年。在清华附中学习6年、工作42年。若从1951年爷爷领进清华园算起，至今在清华园已学习、生活了64年。

陈书祥最初在班上并不起眼，刚从农村来，同其他同学比显得土里土气的，连电灯、汽车都是第一次看见。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表现得越来越懂事，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好。他不但表现好，而且学习也很好，大小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57年7月被批准不参加升学考试，直接保送清华附中的初中。

到了清华附中，他仍然是一个好学生。就在初二这一年，他是班上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作为班长，几乎就跟一个小班主任似的，什么都要协助老师管，如考勤、纪律、学习、课外活动，甚至家访，做一些同学的思想工作等等。

1960年，清华附中扩建高中，陈书祥又被保送升入高中。一上高中，由于是本校保送生，学校知根知底，就让他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如高604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组织委员。那时的学生干部工作的内容不仅多，而且范围很广。当学校有较重大活动时还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利用周日或寒暑假对个别同学进行家访。

升入高中，学校非常清楚他家的经济情况，班主任老师秦永志提醒他应该填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很快学校就批准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8元，并免交学费。

高中毕业前的1963年4、5、6三个月，是他生命旅途中最难熬的日子，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念大学是盼望已久的理想，现在就要实现了，怎能不珍惜呢？念大学也就实现了爷爷的遗愿，“书香”真的进入陈家，以告慰爷爷在天之灵。但是面对眼前家里的现状，他真的不敢再想什么升学的事儿了。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最后还是责任担当占了上风，虽不情愿，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考，直接参加了工作。

当时有三个单位抢着要他：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清华大学附中。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清华附中，于是成了清华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留校工作的第一人。选择留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争口气，爷爷退休后被迫搬出清华园，今天他的孙子又回来了；二是留校离家最近，便于照顾这个家。

三代人的命运折射了怎样的历史

从陈书祥的爷爷来清华工作的1917年，到今天已经整整100年了。他在1959年去世时，不会想到，他的儿子陈彦荣会在七年后就惨死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手下；也不会想到，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孙子陈书祥经历了那样的恐怖时代，走过了那样曲折的道路。

我从1946年一岁随在清华大学当职员父亲来清华，直到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和清华大学里的教授子弟、职员子弟、工人子弟多有交往。陈书祥，无疑是工人子弟中非常优秀的一位。他不仅天资聪明，学习刻苦，而且十分懂事，要求上进，具有社会工作能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不是爷爷和父亲干着重体力劳动却拿着那么低的工资，他完全可以考上大学，实现祖辈的梦想。如果不是父亲被红卫兵残忍地打死，8口人的家庭生活全要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他还有机会深造，展现自己的理想。在清华这个高等学府里，受到文化熏陶又有较好天资的工人子弟，如果在太平年代，本可得到培养，进入精英阶层。我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本是非常羡慕他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这个工人子弟也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在陈彦荣被抓走的前两天，清华园里也发生了“红色恐怖”的“8·24”事件，抓人打人，抄家批斗……许多领导干部、教授和家属中的所谓老地主、老资本家，被打伤甚至打死的都有。

在这样的形势下，几乎没有人是安全的。连几代工人的陈书祥家也未能幸免。所以陈书祥说：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还有人在故意不断地篡改、掩盖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我常常想，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以及诚实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并有畅通的管道，上升到更高的阶层。陈书祥的祖父，凭借自己的双手，干着烧锅炉的艰苦劳动，攒钱买了点土地，怎么就有罪了？土地被剥夺、瓜分了不说，为何又在十几年后把他的儿子打死？陈书祥的父亲，土改时不到20岁，一直在外做工，一直是工人，凭什么要被抄家，在37岁的盛年被活活打死？死后，因为是临时工，没有一个单位过问他的后事，抚恤他的家属（清华、北大和他工作的钢铁学院都不管）。陈书祥，那么淳朴的工人子弟，清华附中的优秀教师，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坎坷的命运？

现在，我周围的有些人还在说，否定毛泽东和阶级斗争观点的都是被整过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后是翻身做了主人的。我要说，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的，不少勤劳致富的农民，被划为地

主、富农，他们的子弟成了政治贱民；曾经的同盟者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转眼间成了“右派”；毛身边的亲密战友，一个个也成了反革命、叛徒、工贼和野心家。工人、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如果反对了毛的思想理论和“继续革命”的实践，同样也会成为“阶级敌人”。老实巴交的工人家庭如陈书祥一家，因“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就遭到飞来横祸了吗？不抛弃这罪恶的理论，不清算那些随意夺取普通人财产和性命的暴行，整个社会就充满了痞气、戾气，你整我，我整你，斗来斗去，只有走向共同毁灭。

如今，文革发生 50 年了，执政者只是从他们在文革中一度受到过冲击的角度来否定文革，而没有彻底否定造成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幌子下，权贵势力大发其财，并垄断性地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阶层的固化更加严重。仅仅凭借个人诚实劳动、努力学习来上升到较高阶层的通道几乎被堵死，陈书祥们后代的读书梦、大学梦更加难以实现。而实现了“血缘资本的代际转移”的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富二代占据着高层社会地位，压榨小民的状况越来越难以改变，这不仅与民主宪政的目标相距甚远，与古代曾经有过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相比，也是一种历史的退步。

陈书祥和我，都是古稀老人了。我们在清华园长大，经历极其简单，思想非常单纯，本希望读书成材，为国效力，度过平安的一生。哪知道，我们却都有那样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经历。作为幸存者，我和陈书祥一样，愿意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曾经有过那样荒唐而残酷的年代，曾经有过那样泯灭人性的施暴者；也曾经有过那样善良无助的弱者，或被草菅人命而死于沟壑，或受尽侮辱，挣扎辗转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愿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尽管这样含着眼泪的写作是极其痛苦的，但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能够剥夺。

2015 年 2 月初稿，2017 年 2 月修改

【生逢乱世】

空向青山问逝川

——我所知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钟裕华

谢声显

1971 年，在持续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一个人检举我曾私下对他说过林副统帅脸上的倒八字眉生得像奸臣。为此，关了我半年“学习班”，没找到任何旁证。6 月底，我却因为这一“现行反革命”罪被抓进四川省万县市（现

重庆万州区)看守所。被捕时我 24 岁，是国营万县市肥皂厂司炉工。

我进监才两个多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突然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民公敌(甚至在批判时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称之为“林贼”)。我的“罪行”自然就不成立了。

不过，当时有句俗话说中国的监狱：“风都吹得进去，雷都打不出来。”我便在万县市看守所 16 仓(万县市看守所称牢房为仓)泡着，直泡了两年十个月，1974 年 4 月 25 日，才被无罪释放。

40 多年过去了，我现已进入古稀之年，一些往事却时时浮现在眼前：

1972 年春的一天上午，我被看守提到预审室。来了一个穿便衣的“一科”干警。“一科”就是政治保卫科。当时还没有“国安”、“国保”，公安局的一科就承担着“国安”、“国保”们现在的工作。

他对我进行“外调”：你的朋友熟人之中，有哪些人符合以下条件：1. 家庭出身不好；2.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 爱好文艺；4. 爱读报，有剪报保存的习惯。

我被押还仓内之后，马上向狱友们报告了出去接受“外调”的内容。大家判断：外面又出现了“现行反革命”的匿名信或传单、标语，当局正在尽力找线索。

没几天，便听外出劳动的人犯说：又有人深夜在背街小巷张贴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说“又”，是因为不过才一两年之前，曾有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署名“忠义救国军”的反革命传单，深夜在国本路、广场一带张贴。公安局就布置了精干警力，天天晚上在那一带进行艰苦的蹲守。果然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抓住了正在墙上粘贴传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冉瑞华。

据时在 4 仓的老犯黄嘉馨说，冉瑞华是个年轻农民，在三正公社也算是个“秀才”，擅长竹琴，曾经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冉瑞华的主罪是“反革命集团案”，但被抓现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审讯中，冉没有交待任何同伙。在监里，冉对狱友们说过：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反革命集团”结案时被处理的只有冉瑞华一个人，他被执行了死刑。

当时有人认为冉瑞华集团案未挖彻底。这才过去多久，小小的万县市又出现了反革命传单！据说就引起了省里的重视，定为大案要案，派了刑侦专家下来，组织了专案组，责令限期破案。

外面查得天翻地覆。关在铁窗里的人肯定都没有嫌疑。我们也就未放在心上，过了几天，便将此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约是秋凉后的一天下午，看守所的杨所长突然来到第 10 仓，把仓里的 13 个人犯带着行李全赶了出来，命令大家将空仓简单地清洁了一番，便将 12 个人

犯分散安插进几个早已人满为患的仓室。却将其中那个久关未判的桂赌棍又关了回去。

在万县市看守所内，只有第5和第10两个仓是坐落于一层台阶的南北两头，门对门相距约30米，与任何仓都不相连接而孤立独处。就桂赌棍那点屁事，即使判刑也不过两三年，他凭什么一个人享受那么宽敞的单间？全监的人犯都愤愤不平。就有关得很久久的老犯分析，可能新查出了桂赌棍有什么能判死刑的大问题，才将他单独关押？

但在半夜，一位戴着手铐略显清瘦的新犯被投进了10仓，我们心中疑问都解开了：他才是腾空10仓安顿的要犯，而那桂赌棍，是当局精心安排的线人。

从第二天始，第10仓就与全监所有仓室隔绝了。里面的两人非但不参加所里的任何劳动、放风，洗漱用水和饭菜都是专人送进去，就连每天两次各仓出来倒夜壶马桶之事，也是全所倒完都进仓关门之后，才由桂赌棍一人来完成。看守所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与10仓的人交谈半句。连老犯们都说，从未见过管得这般紧的人犯！

但没过几天，我们还是从火钩（犯人炊事员）的口中打听到，10仓的要犯姓钟，是城北举人关上面护城人民公社的社员。他就是张贴反革命传单“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现在，正在追查他的同伙。

姓钟的从进监的次日始，每天早饭后便被提出去审问。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高大概1米70，属于精瘦那种体型。他五官端正，肤色较白，不像是个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提审时路过天井，他没流露出半点新进监者常见的畏瑟，却显得神态自若步履从容。

那些天，每当钟被提审出去之后，桂赌棍也会被叫出去。在钟回来之前，桂赌棍肯定会先一阵子进来。

有自作聪明的老犯就说，那桂赌棍会冒充政治犯，以“老资格”的身份在精神上开导钟、生活上照顾钟，千方百计骗取他的信任，利用两人闲聊时，套取钟不肯交待的材料。

我可以负责地说，那时代虽然出过许多残暴的事，但在文革后期我们那里抓进去由公检法人员进行的审讯，还真没搞过刑讯逼供。有老犯说，在1967年大规模武斗时，为何公检法的人有那么多被枪杀或被打残？多半都是原来爱搞刑讯逼供的人遭受到残酷的报复。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这才是现在的审讯者不敢用肉刑的原因。

钟每天早上都是干干净净地出去，午饭之前整整齐齐地回来。我们都有目共睹，他非但未受过刑，连疲劳审讯也未经历。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自己不相信“坦白从宽”，就很难有口供，桂赌棍的任务就很重了。

每天钟被先提出去后回来，桂赌棍后出去先回来地搞了十几天，钟就不再被提审了，只有桂赌棍隔三差五地还被叫出去。

长期关在里面无所事事的人，好奇心都非常强，何况是省里关注的案子！人犯们天天都盯着 10 仓。一个月过去了，我们非但不知这大案要案审得如何，那反革命传单究竟写了些什么，就连钟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些仓里都无人知道。

钟抓进来大约两个月左右，就被判了死刑。过了 3 天的上诉期，他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记忆中，在执行那天，钟被叫出仓，披镣戴铐孤独地站在仓门外的石坎子上，他脸色苍白，身形略显单薄，却腰背笔挺，平静地注视着下面的监区，等待看守来取下镣铐捆上死囚的“背绳”。他冷静从容的神态，深深地镌刻进了目睹者的记忆深处。

原来被疏散出去的 12 个人犯又搬回了 10 仓，桂赌棍被调整到第 6 仓。当局好似忘记了立过功的赌棍，不放不判地又将他泡在仓里了。

再后来，就看见轮到桂赌棍倒马桶时，有时会鼻青脸肿走路一瘸一拐。有一天下午，杨所长刚走进监区，桂赌棍便从牢门上的风门洞里猛地伸出半个脑袋大叫：报告，黄嘉馨天天唆使王石匠打我……话未喊完，他就被人强拉了进去。看不见桂赌棍的头，却听见他的声音传出来：……他们要打死我呀……

这样闹了两次，杨所长就将桂赌棍调出了第 6 仓。

两年后，看守所里的少数人无罪释放了，多数人送进了劳改场，几个人被枪毙了。

文革结束，全国都平反冤假错案，但没听人提起过钟，也没听到过那大案有什么平反昭雪的信息。这位因写过几张传单，用文字表述自己真实想法而付出了生命的男子，在他的故乡已经被人们忘却了。

我从未与钟交谈过一句话，更不知道他做过些什么想过些什么，但许多年来，我脑海里却不止一次地浮现出钟临刑前的身影。碰到当年的狱友，就偶尔问起他来。直到新世纪都开始了，原先在 10 仓关过的郑嘉林，才告诉我：他叫钟裕华。

又听后来与桂赌棍同过仓的黄嘉馨说；钟裕华不管是在预审室面对威严喝斥，或是在仓里受到照顾呵护，他在涉及同伙之问时，一直守口如瓶。但当提审结束之后，只有两人天天面对，桂赌棍终于获得了钟的信任。有一天，他对桂赌棍说：你以后出狱了，去流水村找曾乾明，就说那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没牵涉任何人。

过了没几天，钟就看见曾乾明被抓进来了。他从那天起，便不再吃饭，不同桂赌棍说一个字。当局就每天强制给他输液，一个多星期后执行死刑时，他的身体早就很虚弱了。

“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钟裕华被执行时，同案曾乾明被判了 20 年徒刑。

转眼就 45 年过去了。2017 年春节，一位改革开放后结识的开发商朋友章清华从成都回来了。我意外地发现，在文革时，他是万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钟裕华是他乐队的队员。他说，钟不光会演奏多种乐器，还能作曲，他的书法也不错，宣传队的标语、海报他全包了。连社会上时兴木刻毛主席像时，他只去看了一阵，找齐工具也能刻了！多大张的木刻画贴上大街，许多人都称赞刻得好。章感叹：真是见啥会啥的聪明人！我就想到专案组仅凭罪证定下的几条线索，还真准确。就问，他是你们宣传队的骨干？章清华却说，他没在宣传队干上几个月，上面便命令我清退了他，因为他父亲是地主。清退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歧视，从实惠上来说，因为在宣传队里干，不光比干农活轻松，所在生产队还要记全劳力的工分；宣传队的伙食也比在家里好得多，顿顿白米饭管饱，隔三差五还有肥大块吃。所以，谁都不想走……章清华说，我至今都还记得，钟裕华离开宣传队时那沮丧萎靡的样子！章说，曾乾明也是宣传队的演员，长相很像后来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能唱能跳，还会编些小品即兴表演，插科打诨地很有效果，他还会乐器，也是个多面手。

正月十五，艳阳高照。我同章清华一起到了举人关上的护城村，参加他们部分老宣传队员的聚会。东道主刘兴富是一位六十多岁带几分书卷气的男子，将我们迎进了他的家，一幢两楼一底别墅式的小洋楼，客厅、书房里挂满了主人的书法作品和多种乐器。

我观赏了书法，聆听了二胡演奏，都有一定功底，就问刘兴富跟谁学的。众人便笑：他就是“钟疯儿”的徒弟！

“钟疯儿”就是钟裕华，同是这护城村的人。为何叫他“钟疯儿”？众人异口同声：他每发议论，总是出人意料离经叛道，农民朴实，便认为他神经有点毛病。

民国时，钟裕华的父亲是本村一个小地主，“毛泽东时代”成了专政对象，在 1960 年大饥荒时饿死了。钟的母亲很能干，性格开朗和善，还会接生，村里许多人都是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一共生了 2 男 3 女，钟裕华上面有个哥哥，下面 3 个妹妹。他哥哥是 1967 年大规模武斗快结束时，被特别强调阶级出身的那一派溃败时抓去抬阵亡“烈士”，而后被他们枪杀了。

刘兴富说，当年在生产队干农活，强劳力每天评 10 分，值 1 角钱左右。若有手艺，经生产队同意合法外出打工者，只要每月给集体交 25 元钱（城里面一个普工的月薪），队上便给记 250 分，分给当月的口粮。钟裕华就想出去打工，虽然当时他已在教我乐器和书法了，但他却什么能挣钱的手艺都不会。他就买了几件木匠工具到我家来，将一张木床折散了比划一番，就买木料来依样画葫芦，

做出了一张新床。嘿，还真是那样子。而后他就到处去当木匠，样样木器都敢做。从此，他每月交 25 元钱给生产队，就很少在家做农活了。但大队（村）在路口墙头的标语口号，还是他义务劳动。连专案组初次上山来，看见那些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都夸这毛笔字写得漂亮！

钟裕华只读过 4 年书，便因父亲被划为地主而失了学。我问了在座的几个人，都肯定地说，多才多艺的“钟疯儿”就是个初小学历！

钟裕华案发被捕时，是他新婚第七天。

他的死刑是在横贯全市的那条苕溪河干枯的河床上当众执行的，就在摩岩石刻燃灯古佛下面。

钟裕华被处极刑之后，妻子远嫁他乡。

宣传队的朋友们都因钟裕华的关系而受到过审查。但 40 多年后，他们都还不知道，“钟疯儿”究竟在传单上写了些什么！

丈夫早亡，两个儿子都被杀，钟裕华那性格开朗的母亲竟然还活到了 90 多岁，前几年才寿终。

改革开放之后，平反冤假错案，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全国许多因思想言论获罪的，都平反昭雪了。钟裕华呢？

老宣传队员们异口同声：钟家剩下的都是没有文化被管制了几十年，夹着尾巴过日子的农村女人，敢去找政府的麻烦？

几天后，我和狱友黄嘉馨在一起喝茶。他出狱之后马上报读电大，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本地一位颇有成就的建筑工程师。他在看守所里与“立功”后的桂赌棍同过仓，判刑后在磺厂（劳改场）服刑时，又与曾乾明成了至交，黄嘉馨告诉了我以下的情况——

黄嘉馨与曾乾明是在磺厂相识的。曾乾明比黄先进磺厂几年，编在四大队一中队劳改。曾乾明原本是城里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前，才十六七岁的他就被“动员”到护城公社流水大队作了农民，曾乾明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在农村学了一手砖工手艺，会拉二胡、能唱能跳、也会编些小品即兴表演。

在劳改队，黄嘉馨和曾乾明一起向原军统川东站长高慕超、留场就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王双荣两人学习建筑理论。曾乾明在工程实践上能学以致用，在劳改队的处境比黄强些，他也常帮助黄。黄和他应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感情颇深。坐了 18 年牢出狱之后，曾乾明无家可归，经人介绍，到一家有 3 个孩子的寡妇家“上门”，除了干些体力活儿外，他费尽心思，想办防水材料之类的小厂，但都不顺利。曾乾明重获自由不到 5 年，便郁郁而亡，还不足 60 岁。

曾乾明对黄嘉馨说过：他们张贴出去的传单都是油印的。案发后抄他家时，搜到了一架油印机。那是在公社搞宣传时用的，以前用它印过歌单，用烂了扔在

家里，大家都忘了。专案组将它充作了物证，其实根本就不能使用。真正作案的“油印机”是自己做的：先做一个木框，用圆钢做轴固定在桌面上，油墨调好之后，不用纱网窗也很少用滚筒，而用自己刮好的竹片。钟裕华和曾乾明都是手巧的人，很快便操作熟练了，印出的传单质量比油印机还好些。蜡纸、白纸就用以前在公社搞宣传用来印歌单剩下的，字体都是用的仿宋，内容主要攻击江青、针对文革，说江青有野心，文革革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攻击林彪的只有一次，主要说他篡权野心，搞兵变；还有就是说批孔孟有错，要挽救文化，挽救传统……自造的“油印机”用一次之后就毁掉，又没有去买过蜡纸、白纸，字迹又无特点，就不容易被发现。

在那十年浩劫之中，竟敢以自由和生命作代价，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形成文章并公之于世的，竟是两个加起来不到12年学历的社会最底层的青年农民！

我仰望蓝天白云，和风丽日，举人关遥屹在天际，那几个年轻人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痕迹，不由得想起了一句宋诗：

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研余杂记】

莫将记忆付秋风

——记重庆地区147位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工作

何 蜀

从2011年7月到2013年7月的两年间，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简称文史委）和重庆市图书馆联合开展了一项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工作：录制文革亲历者的口述。我有幸应邀参与其间，有许多收获及体会。转眼几年过去，当年曾参加口述录制的147位文革亲历者中，已有十余人先后病逝，当时跑前忙后主持口述录制具体工作的文史委副主任杨力先生，也在他尚未到退休年龄的2016年4月突发恶性淋巴瘤去世。我作为这一工作的全程参与者，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将有关情况总结、记录下来，供关心文革研究和口述史抢救的朋友们参考。

本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记录和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多年以来，因为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禁忌，使这方面的记录工作也成了许多人不愿涉足的“敏感区”。尽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提倡过把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作为文史资料搜集整理的重要内容，但因为没有具体的

规定与要求，此后虽有一些地方政协文史委主编的文史刊物陆续发表过一些文革题材的回忆文章，却始终未能像以前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等各界社会名流的回忆那样有组织、有规划、成规模地进行。

2011年，重庆市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吴家农先生，向文史委提出，要抓紧抢救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文史委主任李自治，副主任杨力等都积极行动起来。但因他们在文革爆发时只是中学生或小学生，后来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对重庆文革的历史了解不多，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文革亲历者来做口述是个问题。我的一位老朋友邵康庆，原重庆市图书馆馆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政协文史委推荐了我。因为我从事文革研究多年，对重庆文革的大体情况较为熟悉，与重庆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少负责人或骨干成员都有过接触了解。当我得到邀请后，也觉得这对深入了解重庆的文革历史是难得的机会，便愉快地参与到这一工作中。

整个口述录制工作，大致是先物色、联系口述对象，向其介绍口述录制工作的目的和方式，征得同意后约定时间，到时候由政协文史委派车接到重庆市图书馆进行摄像录制。个别年纪太大、身体不好而不便出门者，则直接到其家里去录制¹。

因文革前期重庆市还只辖八区三县，以后行政区划一步步扩大，而当时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时期还不属于重庆管辖的周边地区，与重庆文革有密切关系，今天又已成为“大重庆”的组成部分，因此还专门请来了当年属于四川省江津地区的永川红旗派的主要负责人录制口述，并专程去涪陵、万州录制了当年属于四川省涪陵地区、万县地区的一些文革亲历者的口述。此外，重庆当年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好几位现居成都，还有重庆文革中所谓“萧李廖黑帮”成员、后来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任上离休后也在成都，因此录制组还专程去了成都对他们作口述录制。还有一次计划外的北京之行，是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系好要去采访原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长、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韦统泰，政协文史委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与党史研究室商定后，也就派口述录制组一起前去，对住在医院里的韦统泰将军做了二十多分钟的口述录制。

我在录制过程中，主要是物色、推荐口述对象并帮助作一些联系或说服动员工作，录制前提供一些相关背景资料，录制时在现场作提示、引导或提出一些需要重点了解的问题，录制后根据录好的视频光盘打出口述内容的文字稿²，再由文史委打印出来分送口述者审定和修改。

¹有 95 岁的黄友凡、89 岁的易永中二人是到家里去录制的口述。

²按口述视频打出文字稿的工作，文史委原拟交职高学生来做，但试打出一份后，发现差错太多，因年轻人完全不了解当年情况，连一些当时的常用的时代语言及人名、地名、民间口头语都因听不明白而打错，校改时要到视频中去找原话到底是说的什么，十分麻烦，我就提议由我自己来按视频口述边听边打，速度还快些。此后文史委又找了另一位退休人士帮忙转录了一部分，均交我审校修订。

参加口述者情况分析

在这两年间，共录制了 147 人（女性 10 人）的口述，其中原八一五派 41 人（女性 1 人），原反到底派 67 人（女性 7 人）。当时属于四川省的原永川县 1 人，原涪陵地区 7 人，原万县地区 10 人。其他 21 人（女性 2 人）。

原重庆两派的口述者中，八一五派比反到底派少 26 人，其主要原因是反到底派有个热心人李木森，他既是历史形成的当年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又是一个乐观开朗人缘好的人，多年来重庆一些当年文革人物发起的各种聚会，往往都要请他出面约请人来参加。他从口述录制工作一开始就积极主动为此物色、动员有关人士参加，而且不限于原反到底派的人士，原八一五派的如熊代富、刘德胜等也是他联系、动员来的。而八一五派方面则缺少这样一个热心人。

当年永川红旗派及永川三代会的主要负责人叶大明，也是李木森帮忙联系介绍的。永川红旗派是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认可的“革命左派”，并由成都军区报告中央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了枪支弹药，组建了川东民兵师（实为红旗派的武装力量）。因此永川曾被视为川东的“红色根据地”。录制口述时我们还不知道叶大明与当年永川的对立派工农派的头头也有了友好的联系交往，他所写回忆录都找他们座谈征求了意见。但得知这一情况时录制工作已经面临结束，没有顾得上请工农派的人士也参加口述录制。

原涪陵地区的口述录制工作，得到在涪陵的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张公振与原涪陵忠实派红卫兵总负责人罗成胜的大力支持（最先到重庆录制口述的罗成胜即由张公振引荐）。在涪陵的录制中，他们积极配合，主动联系、介绍口述者，并经常参与陪同，帮助作些提示和解释。可惜的是当年涪陵红卫派人员中只请到一位该组织的发起人李堂皇，没有请到更重要的人士参加口述录制，因红卫派的主要负责人赵树金、况道成等都在 1967 年秋红卫派被支左部队支持忠实派武力驱赶出涪陵县城后，在逃亡途中涉及多批次杀害俘虏的罪行，已经在当时就由司法部门逮捕判刑，刑满释放后去了外地或已经病逝。本来李木森热心联系上了当年涪陵红卫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黄连福——虽然黄连福当时属于重庆八一五派支持的涪陵红卫派，但他和李木森在 1970 年中央学习班里曾“同学”数月，结成了超越派性的友谊。黄连福得知录制口述一事十分高兴，马上答应参加，但不幸两天后在家里卫生间不慎跌倒而意外病故。

当年万县地区造反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把保守派红色派打出县城后，红色派在农村地区以“杀翻天派”为名对“黑五类”人员、家属及造反派实行了大屠杀，

其部分凶手及头头后来被判刑入狱¹。红色派被瓦解。以后造反派又分裂成为两派。这次口述录制时这两派都有代表人物参加，可惜没有找到当年红色派的代表人物。

重庆当年两派群众组织进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各 15 人，因两名副主任暂缺，各有 14 人。常委 4 人中，原八一五派的陈万明、周家瑜参加了口述录制，反到底派的邓长春已故，王兴国失联。省革委委员参加口述录制的，八一五派有吕炎、彭期远、蔺习廉，反到底派有黄廉、段炳森。当年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两派代表各 40 人，副主任 4 人中，八一五派的袁金梁已故，熊代富和反到底派的黄廉、李木森都参加了口述录制。常委 8 人中，八一五派的方文正、韩荣华失联，段德昌已故，赵行贵据说正忙于在医院陪护病人，未能联系上，反到底派的汪友根、蒋良知、雷中伍参加了口述录制，徐光明拒绝参加。市革委委员中，参加口述录制的八一五派有刘德胜、黄荣华，反到底派有吴凤岭、蒋树民、夏祥贵、刘祖国、李政、李天鑫、姜可中、萧星岷，其他委员或是已故，或是失联，或是拒绝参加。

当年重庆两派全市性大组织负责人参加口述的有：

八一五派：革联会²前期熊代富、谭柏树，革联会后期陈万明，工总部³阳增泰，红警区⁴周家瑜。农联会⁵赵行贵未联系上。机关指挥部⁶只有任光泉参加，段德昌已故，邱文玉拒绝参加。文艺界司令部⁷刘志成说正在癌症治疗中，表示婉拒。

反到底派：工总司⁸李木森、黄廉、汪友根、夏祥贵，农总司⁹蒋良知，红中司¹⁰萧星岷，机关司令部¹¹段炳森、栗远奎，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¹²李天鑫。只有大专院校司令部¹³王兴国失联。

¹ 据知情人讲，当年万县地区红色派大屠杀中的凶手被捕入狱后，按杀一人判一年，杀多人的最多判十五年为限进行了判决。但对指使、策划者始终未能追究。

² 革联会：全称为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前期为 1967 年 1 月下旬重庆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向市委、市人委夺权后建议的临时权力机构，主任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均由军队干部担任，1967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发布后，军队干部退出革联会，革联会的执政功能由中央批准建立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取代，革联会后期即成为八一五派的全市性联络、指挥机构，名称也改称“八一五革联会”。

³ 工总部：全称为重庆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指挥部，八一五派的全市性职工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⁴ 红警区：全称为红卫兵重庆警备区，八一五派的全市性红卫兵联络、指挥机构。

⁵ 农联会：全称为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八一五派的全市性农民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⁶ 机关指挥部：全称为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八一五派的全市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⁷ 文艺界司令部：全称为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八一五派的全市性文艺界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⁸ 工总司：全称为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反到底派的全市性职工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⁹ 农总司：全称为重庆农民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反到底派的全市性农民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¹⁰ 红中司：全称为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反到底派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¹¹ 机关司令部：全称为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反到底派的全市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¹² 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全称为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反到底派的全市性文艺界造反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¹³ 大专院校司令部：全称为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反到底派的全市性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联络、指挥机构。

从原重庆两派参加口述者的行业身份可知，当年的中学生、中专生有 38 人，工人及技术人员、企业干部有 35 人，这两类人参加口述录制的最多，其他一些部门很少甚至是空白，如财贸系统无一人参加，重庆两大派的财贸系统主要负责人王绍川、甘廷荣，都拒绝参加做口述，但各有不同的原因。只不过他们都已经 在多年前分别单独给我个人讲述过他们的文革经历，我都已经作有记录。当年重庆的十二所大专院校中，只有 10 人参加了口述录制，其中重庆大学 6 人，西南师院 3 人，四川外语学院 1 人，还有多数学校无人参加，一个原因是不好找人，因大学毕业后许多人都分配去了外地，有的重要人物无人知道其下落。有的人则是对回忆往事表示拒绝，如当时反到底派中有名的重庆大学井冈山负责人徐光明、西南师院八三一纵队负责人周荣，师专八一五派负责人唐忠明，西南农学院八一五派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甘邦举，都拒绝参加口述录制。

当年重庆有七所军事院校，校内的群众组织也跟地方上联系密切而且也分成了两派并参加了大规模武斗，在重庆两派的武斗停火协议上也经常有军事院校代表参加签字。但这些军事院校有的已经撤销，有的如七医大迁走又迁回后又改名为三医大。当年那些学员也基本上去了外地。近年与我有联系的两位也都在外地¹。因此这次口述没有联系到一位当年的军事院校文革亲历者参加。

按当年的政治身份划分，这次参加口述录制的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当权派、支左军人、“黑五类”子女，还有反对文革的“反革命”。因当年的当权派如今已大多过世，无法约请到更多更重要的人物，是个遗憾。原保守派也未能约请到重要的负责人，如当年重庆著名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楚光辉，年事已高，也不愿谈当年事。其他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的主要负责人，都不知下落。

参加口述录制的原造反派人员最多，这也是近年比较突出的一个“失败者书写历史”现象。因这些造反派人员在文革结束之后都经历过“揭批查”、“清理三种人”等运动的反复审查、冲击，有的还被捕入狱或判刑劳改、劳教，仅参加这次口述录制的原重庆两派 108 人中，这类曾遭牢狱之灾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他人凡是当过大小头头的，也大多被关过实为变相监狱的“学习班”²。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是受冤枉的，总想有个机会倾诉，因此听说有这个机会便积极参加。其中一些人是打破多年的沉默站出来做口述，比如原八一五派的学生领袖熊代富，曾官至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后来被当作“三种人”清除出中共，被迫“下海”，历经艰辛后成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原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的团长邱开全，因在武斗中有杀俘罪行而在文革中即被捕入狱，后来被判过死刑

¹ 其中一位当年总字 424 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红联（属反到底派）的陈彬生，所写《一个军校学员的文革回忆》已经在《昨天》第 71 期（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表。

² 在这样的“学习班”里，被清查者受到限制人身自由、施加精神高压甚至殴打逼供等折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到底财贸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常委雷光荣（华山玉食品厂工人），长江电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主要负责人赵本怀（工人）等人就在这样的“学习班”中被逼自杀身亡。

缓期执行。他们都从来不愿接受任何采访，也不愿谈当年事。可是这次听说是由市政协文史委主持录制口述，便都毫不犹豫地答应参加，而且做了很认真很实在的口述。

艰难的抢救

也许有人会以为做口述是很简单的事，不过是听人讲，作好记录罢了。其实这里面的艰难非亲历者很难理解。

要做口述，就得有人愿意讲，而这第一关就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许多年来文革已经成为“敏感”的禁区，你要想找人了解文革历史，常常会得到这样的敏感反应：你想做什么？在这次口述录制中，我就不知为此碰过多少钉子。

有的人一听说是要做文革亲历的口述，十分干脆就拒绝了。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位当年中学生，是该校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而且说他很有思想，见解深刻。我本来以为这样的人应该很容易理解做口述的重要性。但不料打去电话后，他一听我说起这事，马上就打断我的话头，非常愤慨地斥责道：“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你们还纠缠做什么？不要再说了！”

有的人虽然没有一口回绝，让你以为有希望，白费许多口舌，而最后希望落空。比如一位原新闻界的造反派头头，先没有拒绝，只是说要考虑一下。后来经我几次电话劝说，表示愿意参加做口述了。但是当政协文史委与他约定时间时，他却又反悔了，因为当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2013年2月浙江瑞安法院审理判决了在外逃亡几十年的81岁老汉邱日仁文革时期杀害洪云科一案。这一则消息使他大为惊恐，认为“又要重新清算文革问题了，我不能自己讲些出来让人抓辫子”。

还有一位当年较有影响的文革人物，我多次与他电话联系，他都不明确拒绝，而只是推说自己还在外地没有回来。后来据知情人说，他其实根本没去外地，一直都在重庆。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当年一个地区著名的学生领袖，曾担任过地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后来因武斗责任问题被判刑入狱。这次做口述时，重庆市政协文史委通过当地政协文史委联系上他，动员其参加口述录制，他先要求由当地政协出具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后，他又提出要请另一位当年的人物一起参加。当把那位人物也请到以后，他最后明确表态拒绝了，说：“你们少来那一套，我晓得你们就是为了搜集材料，为南方报系那些反毛势力提供否定文革的炮弹！”这样的态度真叫人大出意外，哭笑不得。

即使答应参加做口述的人，也会有思想上的反复。有一位工人造反派头头，先没有表示过拒绝，很容易就答应了参加，当政协文史委按约定的时间派车到他

家外边去接他时，他却把手机关了，文史委的人在外边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而这边图书馆已经做好录制准备在等着了。最后文史委都想要放弃了，他才不知怎么又想通了，开通了手机，出来上车了。

另一位原工人造反派组织头头，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参加做口述，可是当把他接到了图书馆贵宾室后，他一看室内两台定好机位的摄像机和打好的灯光，大惊失色，说：“还要搞这些呀？”随即借口上卫生间，就一去不回，让我们足足等了约二十分钟，大约他又打电话向其他一些人征求了意见，才终于打消顾虑回到录制现场。

口述录制中的几点体会

在这次口述录制之前，我已经陆续接触过一些当年的文革群众组织负责人或骨干成员，但是都没有这一次这样集中，涉及面这样广，因此有些体会更加突出。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口述在抢救史料与互证史实中的作用

口述在抢救个人记忆史料上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许多亲历者甚至是重要的当事人，即使没有顾虑，都很难写出回忆录，有的是因为没有写作习惯，有的是认为写出来没用，有的则是根本没有写作能力，比如这次做口述中的原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主要负责人、曾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刘祖国，是小学都没毕业的造船厂锻工，抡大锤的铁匠，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记忆力好，做口述时还能把文革结束后“揭批查”运动中法院判处他徒刑时的判决书上“刘犯祖国……”的一条条罪状背诵出来。像他这样的情况，显然做口述是最好的办法。而文化较高的人也不一定就会自己写出回忆文字，比如当年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黄顺义，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时称“老黄牛”，了解情况很多，态度也很严谨，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后，还自愿花了许多时间精力搜集重庆大学两派在武斗中死难的27个同学资料(可参阅本刊第35期《为了不应忘却的27个同学》)。多年来我一再鼓动他写回忆录，但他先是推说资料不够，后又说眼睛有了老年白内障，难于写作，总是不愿动笔。而这次一听说做口述，他就积极参加了，还事先写好一篇有关“痛定思痛”之后对文革反思的认识文稿带来，在口述的最后当场宣读。

显然，如果不做口述录存下来，这些不管文化低还是文化高的亲历者的许多珍贵记忆，都只会是“往事如烟”，随风消逝。

在这次口述录制中，我了解到不少过去所接触资料中没有记载或记载不确的史实真相。比如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旁边交电大楼在武斗中被焚毁的真相。当时因

反到底派在大楼上设了个“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影响很大，成为八一五派决心拔除的“眼中钉”，在八一五派组织的攻击中，交电大楼是怎么着火烧毁的，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当年“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站长曾被重庆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关押多年，要逼他承认是自己放火烧毁的大楼，但他当时根本不在现场，拒不承认。后来又有材料上说是八一五派打燃烧弹或扔土燃烧瓶引起火灾，也都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实的依据。这次口述时，当时的八一五派前线指挥杨金华，机校联合兵团的武斗队长，才说清楚了，那是他见久攻不克，调集了几支信号枪，在马路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楼顶上向四楼一底的交电大楼顶层窗户内同时发射信号弹，引燃了室内的易燃物而起火的。

还有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舰队”司令邓长春在“反到底一号”舰艇上召开“烈士追悼会”时枪杀八一五派俘虏二人为“死难烈士”祭灵一事，当年虽经驻军负责人向全市公开批判并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过批判文章，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案，但因邓长春已故，具体“行刑”者也在那之后不久即遭到八一五派追杀死于非命，具体杀俘情节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口述中则有几位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的亲历者——有在河滩上参加大会的，有在甲板上担任警卫的，有在甲板上旁观大会的，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各自记忆中的情景：有人讲到“行刑”者拿枪的手怎样颤抖，有的讲到一位俘虏在临刑前口中一直不停地念叨毛主席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还有人讲到当时有一个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以“首都红代会”名义讲话，强烈要求“反到底派代表山城人民严惩八一五凶手”……这些多角度的回忆补充了很多真实、细微、生动的现场描述，从而使历史细腻鲜活起来，这也正是口述史独特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二、不要迷信口述者在文革中的名气

这一点，在此前我就已经有所体会，但这次口述录制中接触到更多的文革人物时，体会就更深了。有的人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甚至家喻户晓，看起来好像他应该能讲出许多重要的文革历史情况，其实不一定。因为文革中的名气，有时是时势造成的。比如重庆两大派当年都各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人物，成为两大派的“代表”，似乎他们应该了解许多情况，然而在我与他们接触中发现，他们当年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派的攻击而造成的，是被骂出名的。他们成为对立派重点攻击的目标，或是因为被对方认为最有“辫子”可抓，是某派最容易被打痛的“软肋”，或是因为在本派中最喜欢抛头露面，热衷于场面上的活动，因此给对方造成突出印象，就要“枪打出头鸟”。实际上，这样被骂出名的人，却不一定是真正做事的人，对有关的具体活动并不一定了解，甚至问起来一无所知；或者因“名气”所累，想“打扮”自己，有意回避一些重要问题。因此，这种“名人”所作的口述，有价值的史实内容并不多，还不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另有一位号称拥有数十万之众的全市性群众组织的“一号勤务员”，即俗称的“司令”，他们那个组织很有特点：在两派大规模武斗中走“第三条道路”，拒绝参加武斗。因此我对这位“司令”的口述抱了极大希望。结果做口述时，除了他自己怎样起来造反的经过外，对该组织的活动特别是为什么要走和怎么走“第三条道路”的情况，讲不出什么具体内容，似乎处于“失忆”状态，让人大失所望。

三、口述者年龄不宜太大

这次口述录制中，就遇到一个问题，即有的口述者年龄太大，许多该讲的事已经讲不出来了。记忆的流失是残酷的，不管记忆力有多好，也无法对抗岁月浪涛的冲刷。

一位老干部，在前些年已经写了些文革回忆文章，并且自印了一本小册子。虽然其中不免有他多年习惯性的“党八股”腔，许多空话套话，但总还是有些具体史实内容。而在这次口述录制中，他已经基本上想不起多少事情了，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话，最记得的是把他揪到解放碑台子上跪着批斗，跪在石台阶上，往前不小心也要摔下去，往后不小心也要摔下去……翻来覆去讲这几句。提示他讲一下其他事，有的是他前些年文章里写过的，他也想不起来了。

更遗憾的是对韦统泰将军所做的口述录制。事前，我按党史研究室和政协文史委的要求，写了一个采访提纲，提了二十几个有关问题，由党史研究室发给韦老的秘书转交给韦老，以便事先作些回忆思考。但没想到韦老毕竟年纪太大——做口述那年九十四岁了。当年五十四军的军一级领导干部中，除了还有一位副军长外，其他人都不在了，连一些当年的师级干部，比如曾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支左、担任过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九龙，也在几年前病逝了……韦老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一开始就向我们表示道歉，说你们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我都只有交白卷了，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起了。最后他只讲了一个他在1967年初被造反派红卫兵绑架到红卫兵司令部关了几天的事，还讲到五十四军移防离开重庆时受到的空前热烈欢送——看来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情景。因韦老年纪太大，身体不好，已经是以医院病房为家了，那次口述录制时他儿女都在场，不让他说得太多。在我们为他录制口述之后不到一年，就听说他去世了。

有的愿意回忆往事的人，总把回忆往后推，认为要等自己再老一点再做，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人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的。愿意做口述、写回忆的人，都应该趁早，抓紧做。“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不然，等到你终于想要说出或写出回忆的时候，许多记忆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甚至在当年的文字资料摆在你面前时，你也可能回忆不起来了。原重庆财贸八一五的主要负责人王绍川，曾担任过重庆夺权之后的革联会副主任，在军队干部支持下主持日常

工作。他多年前找我帮他整理回忆，我请他先口述，我记录，结果恰恰是他文革中最重要的革联会时期那一段，他讲不出什么具体内容来，我把当年革联会的《山城战报》上有关他主持某次会议的报道拿给他看，他面对白纸黑字，也完全想不起一点具体内容或细节了。

四、必须做好口述前的案头工作

抢救口述，绝不是只管录制或记录下来就算完事，必须做好事前的案头工作，查看相关的资料，了解相关的背景，考虑好需要提出的问题。在这次口述录制中，有几次因时间安排或其他原因，我未能到场，而在场的文史委人员完全不知道口述者当时的情况和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与背景，不能提出必要的问题，因此就只能听任口述者随便讲，效果就不理想。有的口述者认真重视这件事，自己就准备十分充分，不但找出了当年的一些相关资料、笔记本、老照片，有的还写了简要的提纲或开头、结束的讲话文字稿。有准备与没准备就大不一样，录制下来的内容就要丰富、准确得多。

还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在搜集整理重庆武斗死难者名单，在与一些口述者联系时，顺便问起他所在单位武斗中是否死了人、死了什么人的情况，希望能在做口述时带个具体的名单来，好几位口述者都带来了写好的本单位武斗死难者名单交给我，并在口述中对一些死者的情况作了具体介绍。

五、不能满足于一次性记录

这是我在长期的采访调查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一定不要满足于只听他讲一次，最好能在不同时间里听他反复讲多次，或者对其某些细节反复再问几次。因为口述的随意性很强，在第一次讲述时，他可能会为因思路的跳跃或当时考虑表述的重点不同，而把某些重要细节忽略过去，或者因兴之所至的夸张、无意间的口误而讲错什么细节。若能多反复几次，就有可能作出一些自我修订或补充。这次口述录制，虽然限于安排上的原因，每个人都只录制了一次，但在口述文字稿整理出来之后，又送交其本人审定修改，也起到了反复的作用。有的严肃认真的口述者，就在修改文字稿时作了不少修订、补充，有的甚至补充了整页的文字内容。有的更认真的口述者，甚至还把整个修订稿拿到打印店去重新打印后再交给文史委。

本来这个口述录制工作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因为市政协领导换届，新任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不再热心此事，就只好告一段落。在后期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又遇到实际操作此事的杨力先生突然病逝，让人万分遗憾。不过，毕竟已经录制了这样一大批不同身份和经历的文革亲历者的口述，这在全国各地可能都还是不多见的。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有识之士，也把这种抢救性的工

作做起来。能做一点算一点。做了总比不做好。在中国，许多事都是事在人为，有些看起来很难的事，只要有人决心做，坚持做，总是可以做成一点的。

年纪比我小十岁的杨力先生，在生前曾向我表示，他在做这次口述录制中，对文革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准备退休后也全心参加到文革研究中来。可惜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了。谨以此文表达对杨力先生的怀念。

（下图：2013年3月7日在廖伯康家录制口述，左起：廖伯康、杨力、何蜀。照片摄影刘贵辉，摄像朱昊。）



2017年4月26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附录1 参加口述录制的文革亲历者名单

按不同地区、身份并分别按录制时间先后简介¹。

原重庆八一五派

1 熊代富：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负责人，革联会副主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市委书记、中共市委常委

2 郑志胜：重庆大学学生，武斗中专门为重大八一五处理尸体而被戏称的“尸长”

3 任光泉：重庆市经委干部，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发起人和早期负责人

4 周家瑜：重庆大学学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重大革命

¹ 除“其他”类中的几位文革研究者外，每人姓名后是当年的身份及任职情况。

委员会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5 陈万明：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工人，革联会后期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大渡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 杨金华：机器制造学校学生，机校联合兵团武斗队负责人

7 黄荣华：女，长江电工厂工人，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8 吴崇仁：六中学生，32111 战斗团一般成员

9 杨世元：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革联会罗广斌专案组编外人员¹

10 黄顺义：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负责人，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1 徐勍：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八一五“叛徒罗广斌”展览解说员

12 彭期远：机校学生，机校兵团主要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3 扈来明：一中学生，八一五派群林市场“痛打落水狗”广播站站长兼主播

14 蔺习廉：长江机床厂带技校学生实习的教师，八一五机械兵团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15 蒋蒲勋：西南师院附中学生，附中“无产者”负责人

16 牟成彬：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学生，技校“六二五”骨干成员

17 喻重书：六中学生，32111 战斗团一般成员

18 汤大华：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负责人，北碚捍红总部主要负责人

19 范天杰：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东方红战斗兵团负责人

20 苑隆伟：建设机床厂工人，八一兵团 6657 团“狂飙”队骨干成员

21 吕炎：长航 661 指挥部干部，长航兵团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航重庆分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2 罗恩宇：六中学生，32111 战斗团一般成员

23 邹越滨：二十九中学生，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一般成员

24 马述林：二十九中学生，《毛泽东主义战报》编辑

25 袁光厚：新华社四川分社重庆记者站记者²

26 曹登驹：师专附中学生，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骨干成员

27 刘德胜：江陵厂工人，八一兵团六五团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28 何国光：重庆大学学生，《8·15 战报》编辑

¹ 杨世元因曾在《重庆日报》副刊组工作过，文革初期受《重庆日报》“三家村”案牵连，被市委驻文联工作组作为审查对象，罗广斌等在文联机关造反夺权后，仍将其作为“黑帮爪牙”监督劳动，罗广斌自杀后，八一五派为反击反到底派在罗广斌问题上的宣传，组织了“罗广斌专案组”，调杨世元参与工作，但因杨的文革初期问题尚未作出结论，因此只将其作为编外人员，外出介绍信上都不写他的名字。

² 当时新华社重庆记者站只有袁光厚一人是八一五派观点，其他全是反到底派组织成员。

- 29 熊文书：四十一中学生，四十一中东方红主要负责人
- 30 姚永年：建设厂工人，八一兵团 6657 团负责人
- 31 谭柏树：重庆市曲艺团创作兼演奏员，革联会常委，曲艺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32 李何明：江北区东方红公社农民，红农八一五区分部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常委
- 33 阳增泰：朝阳电机厂调度员，八一兵团总部、八一五工总部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
- 34 毛熙华：轮胎厂工人，八一五派中梁山地区指挥部负责人
- 35 陈锦巡：南纪门中学学生，校八一五负责人
- 36 谢武周：空气压缩机厂工人，八一兵团总部负责人
- 37 黄莹作：造漆厂保卫科干事，八一五派石坪桥地区副总指挥
- 38 李维金：长江电工厂技术员，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39 蒋兴忠：无线电厂工人，厂八一兵团负责人
- 40 易永忠：长江电工厂供应科长，厂八一五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 41 王永川：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赴南充火花公社调查李井泉问题小分队成员¹

原重庆反到底派——

- 1 李木森：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工总司勤务组、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2 朱登明：市中区建筑修缮联社施工员，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主要负责人
- 3 邱开全：北碚区红岩公社农民，北碚猛虎团团长
- 4 黄廉：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站采购员，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5 黎敦智：长安机器厂技术员，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
- 6 蒋良知：北碚区蔡家公社农民，农总司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 7 朱兆康：江陵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员，工总司组织部副
- 8 黄开全：师专附中学生，师专附中红卫兵、重庆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
- 9 王三恒：长航水手，长航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
- 10 李正权：南山中学学生，黄山军工红二连成员
- 11 苏静康：江陵机器厂技术员，反到底江北指挥部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¹ 南充火花公社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抓农村工作的蹲点单位，在造反派心目中就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一样，因此当时重大八一五派出的这个小分队将调查报告起名为《西南的“桃园”》。

- 12 萧星岷：三中学生，井冈山红卫兵、红中司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13 刘锡邦：长江电工厂技术员，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
- 14 王世伦：嘉陵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组织部长
- 15 李祖楞：二十九中学生，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 16 刘先裕：四十一中学生，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总指挥
- 17 杨向东：西南师院中文系教师，教工总部、西师八三一骨干成员
- 18 姜可忠：河运学校教师，教工总部勤务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19 刘祖国：江北造船厂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20 杨国成：402 工区工人，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
- 21 杨广德：柴油机厂工人，黄山军工红二连排长
- 22 夏祥贵：钢材改制厂工人，二轻兵团主要负责人，工总司发起人及勤务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23 韩平藻：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红中司骨干成员
- 24 李方成：天原化工厂干部，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
- 25 刘懋雄：学田湾门诊部主任，反到底卫生总部负责人
- 26 汤双成：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航锋战斗团骨干成员，战报编辑
- 27 蒋国志：建设机床厂工人，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
- 28 孙建国：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航锋战斗团骨干成员
- 29 田学恒：三钢厂工人，三钢延安兵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江北指挥部勤务组成员，工总司钢铁总部主要负责人
- 30 贺锡君：重庆铁路分局干部，铁路分局火车头公社负责人，反到底驻蓉联络站站长
- 31 吴凤岭：长安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后勤部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32 谈孟蜀：望江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金猴”连长
- 33 雷午生：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主要负责人
- 34 何开泰：公安局交警队警察，公安红一方面军一般成员
- 35 林家臣：前卫仪表厂工人，工总司办公室主任
- 36 李政：女，红旗棉织厂学徒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37 谭冠华：电力技工学校学生，电技校井冈山主要负责人
- 38 雷中伍：电力学校学生，电校东方红主要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 39 曹明忠：涂山高中学生，中学生红卫兵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 40 李明全：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干部，市委机关井冈山工作人员
- 41 漆宗森：四十一中学生，反到底派一般成员

- 42 陈共珏：女，四十一中学生，井冈山红卫兵一般成员
- 43 李炳南：官井巷民办中学校办厂工人，工人造反军三分团团长
- 44 杨免：西师附中学生，附中“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
- 45 向卫国：女，西师附中学生，附中“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工作人员
- 46 邹红斌：十三中学生，十三中东方红九八战斗团主要负责人
- 47 王雪兰：女，市第一人民医院干部，反到底卫生总部一般成员
- 48 曾有才：四十一中学生，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纠察队长，播种机宣传队负责人
- 49 胡勉初：四十一中学生，四十一中反到底兵团独立排一般成员
- 50 邹雨林：群众艺术馆干部，文艺界红一方面军主要负责人
- 51 汪友根：供电公司修试场工人，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总工会主任，中共市委常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¹
- 52 岳朝亮：西南师院学生，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前期负责人
- 53 贺实践：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美院红色尖兵团骨干成员
- 54 李天鑫：重庆市歌舞剧团演员，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55 段炳森：重庆市体委举重运动员，反到底机关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 56 刘国章：十中学生，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一般成员
- 57 蒋树民：重钢公司运输部工人，重钢遵义兵团、工总司钢铁总部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重钢公司党委委员，公司运输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58 倪伯华：巴县四中学生，木洞镇反到底指挥部勤务组成员
- 59 薛承刚：建材公司一砖厂政工干部，永红战斗团负责人，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60 李朝林：南纪门中学学生，校反到底派负责人
- 61 唐工：大坪中学体育教师，工人造反军总部宣传部长
- 62 冯俊华：女，西南师院学生，工总司工作人员
- 63 王富美：女，一中学生，红中司工作人员
- 64 栗远奎：民政局干部，反到底机关司令部负责人
- 65 黄国平：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航锋战斗团团部秘书
- 66 涂淦：西南师院中文系学生，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驻北京代表
- 67 杨晓渝：女，三十中学生，工农兵文艺公社文艺宣传队成员

¹ 汪友根于 1974 年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他在任时省委第一书记先后是刘兴元、赵紫阳。

原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

1 叶大明：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永川红旗派主要负责人，永川三代会勤务组组长，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原涪陵地区（今重庆市涪陵区）

1 罗成胜：涪陵一中教师，“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主要负责人，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

2 宫家和：涪陵地委副书记兼涪陵县委书记，涪陵地区二号“走资派”

3 喻森林：涪陵郊区农民，农代会负责人，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4 况太志：涪陵新力机械厂工人，工代会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 李堂皇：涪陵地区商业局干部，红贸派发起人

6 张公振：涪陵郊区小学教师，农代会工作人员

7 王治林：涪陵临时工，忠实派一般成员

原万县地区（今重庆市万州区）

1 江源：云阳农场知青，秋收起义派一般成员

2 陈仁德：忠县初中学生，后为地方志编撰者

3 刘国平：万县市三中学生，赤旗派一般成员

4 谢声显：万县市临时工，《江城战报》编辑

5 伯为豪：万县人委文教科文书，万无司主要负责人，地革命委员会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 郭敏生：万县市百货公司职工，工人造反军主要负责人

7 熊瑞成：万县市待业学生，主力军派骨干成员

8 熊道生：万县市江城旅社服务员，主力军主要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9 程克健：万县市人民路中学学生，校赤旗派负责人

10 杨德华：万县市搬运公司工人，主力军交通分团负责人

其他——

1 何蜀：文革研究者

2 李普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原共青团重庆市委学校少年工作部副部长，文革中仍被强留在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的“摘帽右派”

- 3 曾钟：重庆沙坪公园文革墓园死者情况研究者
- 4 陈晓文：最早开始研究重庆沙坪公园文革墓园情况的研究者
- 5 江金熙：四十一中学生，中学生北上告状团纠察，后为逍遥派
- 6 陶维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处长，任白戈的秘书
- 7 张光明：市人委办公厅秘书，驻重庆大学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
- 8 吴登明：1967年10月调四川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任重庆特殊钢厂军代表
- 9 徐小川：四十一中学生，后为反到底派观点¹
- 10 谭海庆：女，四十一中学生，从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八一五派的一般成员²
- 11 王喜中：四十一中学生，先为学校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后为反到底一般成员³
- 12 刘同飞：四十一中学生，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市政协著名人士刘宗宽之子
- 13 邹习新：四十一中学生，原官办赤卫军纠察，后为反到底派一般成员
- 14 黄友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驻重庆日报社工作组组长
- 15 王苏苏：女，四十一中学生，“黑五类”子女
- 16 韦统泰：文革前期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长、重庆警备区司令员
- 17 廖伯康：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文革初又被作为“黑帮”抛出批判的所谓“萧李廖集团”成员
- 18 汪启信：五十四军宣传队代干创作员，1967年参加万县地区支左
- 19 冯炼：铁铸管厂助理技术员，八一五派一般成员，武斗中走“第三条道路”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战恶风》报编辑
- 20 张庆豹：南岸大佛段建筑修缮社工人，因起草反对文革和批判毛泽东的传单而被判死缓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主犯”
- 21 白智清：重钢机修厂技术员，1976年批邓运动中因公开为邓小平鸣冤、批判张春桥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著名人物

附录2 原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口述者当年职业身份分类

大学生：

熊代富、郑志胜、周家瑜、黄顺义、汤大华、何国光、岳朝亮、冯俊华、涂淦、王永川

¹ 未实际参加反到底派活动，类似于逍遥派。

² 口述中主要讲的“破四旧”情况。

³ 口述中主要讲的“破四旧”情况。

大学教师：

杨向东、

中学生、中专生：

杨金华、吴崇仁、黄开全、李正权、萧星岷、彭期远、李祖楞、刘先裕、扈来明、蒋蒲勋、牟成彬、喻重书、韩平藻、汤双成、孙建国、范天杰、罗恩宇、邹越滨、马述林、雷午生、谭冠华、雷中伍、曹明中、漆宗森、陈共珏、杨免、向卫国、邹红斌、曾有才、胡勉初、贺实践、刘国章、陈锦巡、倪伯华、李朝林、王富美、黄国平、杨晓渝

中学或中专教师：

姜可忠、蔺习廉、唐工

工人及技术人员、企业干部：

李木森、朱兆康、陈万明、黄荣华、朱登明、黄廉、黎登智、王三恒、苏静康、刘锡邦、刘祖国、杨国成、杨广德、夏祥贵、李方成、蒋国志、田学恒、苑隆伟、贺锡君、吕炎、吴凤岭、谈孟蜀、林家臣、刘德胜、李政、姚永年、李炳南、汪友根、阳增泰、毛熙华、蒋树民、谢武周、薛承刚、黄云作、易永忠

农民：

邱开全、蒋良知、李何明

机关干部：

任光泉、李明全、栗远奎

文艺界：

徐勍、杨世元、谭柏树、邹雨林、李天鑫

体育界：

段炳森

卫生界：

刘懋雄、王雪兰

新闻界¹：

袁光厚

公检法²：

何开泰

¹ 重庆新闻界当年的两派负责人中，反到底派的沈世鸣（女）已故，八一五派的联系到一人，但被拒绝。

² 重庆当年公检法两派的负责人及骨干没有联系到一个。参加口述录制的何开泰只是公安局基层交警，因去工业校找朋友玩，偶遇八一五派攻打工业校的“七二五”事件，被八一五派俘虏后关押在重大审讯、折磨，后来好不容易逃出。他口述的主要是这段个人遭遇。

【本刊特稿】

塔园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兴亡史略

徐小青

广东汕头澄海塔园文革博物馆（简称塔园），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内，由民间集资创建。自 1996 年始，逐步建成以反思文革为主题的八大景区 25 个景点，融警世启示于自然景致之中。塔园包括房屋建筑、立碑、塑像、广场等占山地面积约为 300 亩，前后耗资 2000 万，主要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汕头交通、能源、通讯单位以及海外侨胞捐赠。二十年来，塔园在政治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历经曲折。2016 年 5 月开始，塔园文革博物馆遭到封禁，随即更被实施全面销毁。为尊重历史，特将塔园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兴亡史简记录存，以供后人了解。

1996 年

秋，已故老干部许士杰（曾任中共澄海县委书记、海南省委书记）生前友好在澄海塔山风景区，兴建纪念人民公仆许士杰的“葑菲阁”。时任汕头市副市长的彭启安到塔山参与活动，无意中发现北面山坡上有一片乱坟，得知是在澄海文革期间被活活打死的 400 多人中的 70 多人，死者亲属将死者尸骨移葬于此。彭



启安萌发了一个念头，决心在无辜死者的墓地，建立一些纪念性标志，以告诫人们：不忘文革痛史，以史为鉴。（左图：彭启安先生近照。）

彭启安向潮汕地区若干老同志征询“建立文革纪念标志”意见，得到陈谦、庄明瑞、李习楷、陈德鸿、郑瑁、杨方笙、余昌敬、卢潮雄、陈昭民、罗庭勇、谢松伟、杜惠崇、麦广顺、王平、林正孝等的赞同，并发起倡议。塔山所在地涂城村以杜炳合、杜秋福、朱立浩等为首的村党政领导，也积极支持，决定划出一点村属山地以供建设。村党政在向上级请示时，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信息“可以不搞就不搞，如果老同志们坚持要

搞，就让他们去搞”。于是，以彭启安为首的老同志便开始规划和设计，通过民间集资筹办的途径开始建设，形成了文革罹难者纪念地首期工程建设的雏型。

1997 年

6 月，由首倡者彭启安牵头，塔园建设管理委员会于 11 日在塔山召开座谈会。与会者有老同志、设计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村干部、社会热心人士等。由潮州古建筑设计师邱创平介绍塔园建设首期工程“碑廊铭史”的设计方案，与会者审查并通过。会议决定将拟建的文革罹难者纪念地正式定名为“塔园”。“塔园”二字由郑瑀书写。会议并决定：每建成一个景点，即向游客开放。

10 月 25 日，塔园第一期工程开工，由当地民间工匠承担基础石作、土建。

△向社会征集数件碑文。潮汕老同志杨方笙、陈德鸿、陈亿秀、陈惠国等一批文化人积极参与。

△时任汕头市政府顾问的彭启安，将市长基金 60 万（按当时规定市长有权批准的有关建设项目用款）投入塔园建设。

△发动民间募捐。最早捐款的是汕头交通、能源、电讯各单位及潮汕地区（主要是汕头，揭阳，潮州）的有识之士、死难者亲属，香港等外地朋友也纷纷响应。八旬孤寡老人、老干部陈旭隆女士，把两万多元积蓄全部赠予塔园建设。

△塔园募捐的建设资金纳入塔山风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专款专用。

△第一期工程进展顺利。然而，一些参与者仍心有余悸，如涉及文革悲剧惨景不敢写得太真实，把“打死”、“冤死”都写成“遇难”，写联、匾也不敢署名等。

1998 年

4 月，塔园第一批景点竣工，包括“碑廊铭史”、“心碑永矗”、“恸石志恨”以及“大山门”、“小山门”等。

△碑廊铭史的前面碑墙“千秋永志碑”，镌刻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有关文字以及澄海本地文革灾难历史等；后面碑廊记述十几位本地文革罹难者（地区专员等）的悲剧简况以及大量诗词箴言，以寄托哀思，表达对文革浩劫的批判。

△心碑永矗主要是在园区中心安放一心形大石，上面铭刻资深老革命李锐悼念胡耀邦的名句“活在人心便永生”七个金色大字，颂扬缅怀胡耀邦同志，借以怀念在文革中冤死的人们。

△恸石志恨是利用一天然巨石，镌刻“恸石”两个大字，由吴卫宇书写。恸石直面冤莹，寓意“磐石吼恸，恨凶顽之暴行，愤天理之无存”。

4月5日，塔园召开座谈会，讨论第二期工程建设，即修建一座象征塔园标志的主塔及四个小塔，并听取专家介绍设计方案。会上讨论热烈，最后一致决定：主塔构建为七层石塔，定名“思安塔”，意在警示世人不能淡忘文革痛史，牢记居安思危。此后工程启动。塔园建塔将弥补塔山原本无塔的缺憾。

4月上旬，澄海市（时为县级市）领导听到有“塔园建设是敏感问题，影响安定团结”的反映，随即到塔山视察，认为塔园建设与中央指示不符，文革伤疤不可揭。故要求塔园建设停工。但表示主塔可以修建。鉴于一期工程已进行到一定进度，该领导提议在塔山找一僻静处建一个馆，把已建成的石碑铭文等搬进馆内，只供“符合观看条件的人”参观。

△塔园倡建者不服，写报告给澄海党委，阐明：建设塔园是“符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的”。后来接手工作的澄海领导采取了冷处理，不置可否，问题就一直拖下去。

△自4月17日至年底，塔园建设工程被迫停工八个月。

△面对塔园建设的阻力，倡建塔园的一批老同志及热心人士仍信心不减，继续宣传和筹集资金。这一年，得到潮汕地区许多单位和个人的不断赠款，还有香港朋友的资助。北京原国家广电部科影部政治部主任、88岁高龄的陈曙光老人，为塔园题写了“建设塔园，启迪后人”。

1999年

这一年汕头市政府顾问彭启安退休，他继续发挥余热，致力塔园建设。

1月23日，按市政领导“塔可以建”的允诺，主塔“思安塔”的工程启动，由涂城村党政举行开工典礼。“思安塔”三字为书法家陈大羽题写。

10月，澄海市领导向汕头市上级领导写出有关塔园问题的报告，此报告分发到有关部门征询意见，同时责成主管部门到塔园现场调查。

△老同志们对塔园建设可能遭遇的阻碍都有思想准备。九旬老人庄明瑞说：“塔园的建设要坚决按计划进行，如果‘理唔直，无解决’就告到中央去，我走在前，要枪毙对我先开第一枪。”

△最后汕头市领导采取了沉默态度。塔园倡建者认为，这就是党政对塔园建设的默认。至此，塔园建设阻力渐消。

12月，塔园建设委员会出版了宣传塔园的专辑《塔园留踪》，内容主要为杨方笙、柯培忠、王纪平、黄赞发、黄松坤、丁丽文等一大批潮汕文化人所作的大量诗词、书画，介绍塔园景点及名人题词、悼念文等。由谢松伟、李修潮编撰，汕头画院名誉院长蔡仰颜题写书名。印刷五千册。

本年度，社会各界继续为塔园建设捐款。

2000 年

2月2日，塔园召开座谈会，总结塔园第一、二期工程情况，并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塔园建设等问题。

2月5日，春节期间，思安塔对外开放，塔山风景区游客激增。

3月10日，新加坡华侨吴松泉先生捐款建立孔子石像。塔园倡建者认为，这位古代圣人在文革中竟也遭劫，为孔子立像，既是平反，也符合“以德治国”主旨。

4月22日，塔园广场边挡土高墙垮塌，原因是前期工程的测算技术问题，以及为了省钱而工程不到位。这是塔园建园以来较大的事故损失。塔园倡建者立即组织抢修加固，保证了正常开放。

9月16日，塔园举行孔子像落成典礼。此景点称“孔圣宣仁”。

12月底，《塔园留踪》修订本再版，印刷一万册，进一步扩大塔园影响。

本年度继续完善园区内道路、停车场等基本建设；继续发动社会捐款，有的单位一捐再捐。

2001 年

2月，塔园倡建者开始酝酿再建新景点，并进行规划和设计。

4月，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看了《塔园留踪》一书后，为塔园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塔园建设者受到极大的鼓舞，立即将任仲夷题词镌刻于石碑，立于“思安塔”前，人们称之为“镇山石”。

10月，确定建立明镜台等景点，并酝酿设计、施工方案。

11月1日，明镜台景点动工。“明镜台”三字由老同志庄明瑞题写。

11月5日，冤莹长青景点动工，即为合葬在此的本地数十位文革遇害者的墓区中砌建台坛，树立一石表，上书“冤莹长青”四个绿色大字，以作永祭。该景点不久竣工。

本年度，社会各界人士更加热心支持塔园，继续捐款，有的朋友如民营企业的邱诗庆先生，一捐再捐，使工程顺利进行。

2002 年

1月，史鉴山屋景点工程开工。此处建成后，拟收藏有关文革以及其它政治运动相关的书籍资料等。“史鉴山屋”由李习楷题写。

2月10日，明镜台景点建成剪彩。此处有石镜一面，石书若干，寓意“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还立有对结束文革起到重要作用的广东籍老师叶剑英石

像等。

3月30日，香港李嘉诚先生在回复塔园的信中说：“塔园建设意义重大”，并赠款30万元。塔园决定兴建榕石峰，铭刻惠文，以赞扬李先生的爱国精神。

6月1日，举行史鉴山屋、榕石峰落成典礼，同时举行仪式，接纳社会热心人士向史鉴山屋赠书。

6月9日，著名作家权延赤到塔园参观并题词“塔山为镜，后人作鉴”。

9月30日，在市老年书画研究会的支持下，塔园决定筹办宣传塔园书画展。

10月5日，汕头市长李春洪在澄海有关领导陪同下视察塔山旅游景区时，主动提出看看塔园。李市长在参观过程中对塔园建设予以肯定和赞扬，并题写“告慰前人，激励今人，警示后人，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在参观叶剑英石像时，提出改为铜像，并亲自聘请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专家吴雅琳教授担当设计工作，同时发动深展公司李岸生先生专项赠款。

10月30日，石笔峰景点动工。设计为擎天石笔及无字石书页组成，寓意在空白书页上乘笔直书文革历史。“石笔峰”由杜应强题写，邱诗庆先生赠款兴建。

11月，警钟长鸣景点工程动工。设计为平顶四柱亭，四角各挂一口铜钟，亭中树立任仲夷像碑，铭刻他“不能淡忘文化大革命”的警言，由尧相辉及陈曙光分别题写。

12月底，著名作家、全国作协副主席冯骥才给塔园来信予以勉励，并赠送墨宝：“愿塔山是文革永远的墓地”。

△华能总公司总经理汪德方、朗成伟、副总经理王玉田先后参观塔园并题词；邹瑜等三位离任部长同时参观了塔园。

△本年度，潮汕地区更多的单位和个人为塔园建设捐款。

2003年

1月1日，汕头市老年书画展在塔园举行盛大开幕式，300多人参加。展出作品240幅。主题为：“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革悲剧重演。”

2月11日，塔园隆重举行叶剑英铜像暨石笔峰、警钟长鸣景点落成典礼，出席者近千人，气氛热烈。汕头市长李春洪在叶剑英铜像前献了花篮并讲话，副市长钟展南也讲了话。参加活动的还有副市长苏耀光、原市长陈燕发、吴波，原揭阳政协主席陈德辉以及原汕头大学书记黄赞发、杨应群，原潮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和钦以及老同志庄明瑞、蔡名池、张第高、陈绍卿等。澄海市政有关领导以“中央文件强调立伟人像必经中央批准”为由，未出席落成典礼。

3月12日，南方大学130位校友到塔园向叶剑英铜像献花篮。

3月13日，《汕头都市报》报道了塔园。

5月8日，即将调任的李春洪市长，将一套香港出版的大型画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主编者杨克林）送给塔园主要倡建者彭启安，希望“史鉴山屋”收藏。彭启安阅读后，即构思在塔园兴建一座建筑物，将本书的内容全部展示。

10月，第三版《塔园留踪》增订本出版，其内容更加丰富。由林明舜等负责修订，印刷一万册。汕头市委副书记钟展南为该书写了序言。

10月4日，重阳节，汕头市举行千人登塔山活动，参与者参观游览了塔园。

12月10日，香港《凤凰周刊》24期报道了塔园，称之为“中国首个民间文革博物馆”。

12月29日，中国老年旅游联合体的70多家单位总经理集体游览了塔园。

△本年度，塔园继续完善配置各景点的设施。

△老年志愿者沈观齐夫妇到塔园住两个多月，加强了塔园的宣传和管理。

△市里许多离职及部分在职领导，陆续到塔园参观并为塔园题词。

△潮汕地区各诗社及香港朋友，纷纷为塔园作诗书画。

△本年度社会各界及香港同胞继续为塔园建设捐资。

2004年

1月1日，以塔园为主题材的王昭文等摄影作品在塔园开展。

1月9日，《汕头特区晚报》转载了《凤凰周刊》关于塔园的报道。

2月2日，塔园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一座文史馆，以展示大型画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全部内容。与会者经过激烈争论，排除干扰，打消顾虑，文史馆正式定名为“文革博物馆”，名副其实。邱创平设计师介绍了设计方案：仿北京天坛古建筑，三层楼宇，面积570平方米。

3月，文革博物馆工程正式动工。由林川题写馆名。

4月8日，台湾著名潮汕籍政论家、作家沈野参观塔园并赠款。沈野还就塔园的建设和管理，热情地献计献策。

10月1日，汕头翠园诗社与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在塔园联合举办书画展。

12月20日，天坛式建筑文革博物馆竣工，之后即对外开放。馆中底楼环形壁采用乌石影雕工艺，展示《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画册全部内容，呈现中国文革运动的全过程，共29万字、1100张图片。厅中并放置展柜，展示有关文革书籍、文物等。

12月，完善了塔园文革博物馆大山门、登山路、塔园简介碑等工程。

△文革博物馆建成后，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的知名诗人、画家等送来的贺诗、贺词与书画作品等，皆陈列于文革博物馆二、三层。

△本年度，塔园继续得到社会各界单位和个人以及香港、泰国华人的捐助。

2005 年

这是塔园建园以来最为不平凡的一年，风云迭起，阴晴不定。

2月4日，原常务副市长黄荣汉向市长建议，拨一点款支持解决塔园的经济困难，得到市长黄志光的同意，批示市旅游局、交通局出资支持塔园建设。

（右图：被毁坏前的塔园文革博物馆大山门。）



2月8日，塔园魂景点建成。

“塔园魂”三字选自文革中被冤死的副县长王鼎新遗墨（王生前善书法并编有字帖）。

2月13日，汕头岭海诗社在塔园举办书画展。

3月3日，塔园大钟楼景点开工。计划内置一口大铜钟，使警钟声更加洪亮悠远。

3月26日，汕头市委书记林木声在区陈国光书记、镇陈海荣书记、村朱立浩副书记等党政领导及主要倡建者彭启安的陪同下，视察了塔园。林书记正面肯定了塔园并表示要帮助进一步完善塔园，令塔园建设者欢欣鼓舞。

4月17日，《汕头都市报》报道“塔园建国内首家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5月1日，潮州瀛园诗社等三家在塔园联合举办书画展。

5月8日，《南方都市报》撰文：为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民间性质叫好。

5月9日，塔园忽然被告知：塔山建成文革博物馆之事，中央知道了，省委主要领导也知道了，省委宣传部即将派人前来调查。

5月11日，省委宣传部两位处长到塔园现场观看后，在澄海开座谈会，之后又听了彭启安介绍情况，并未发表意见。但市领导仍做了若干有关“稳妥”的指示。塔园建设计划只好往后推迟，社会上传开了“塔园被关闭”、“彭启安被处理”等流言。

5月17日，正在修建的大钟楼被迫暂停，等待上面的消息。

6月，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主任记者饭野克彦造访塔园，受到彭启安接待。7月6日，饭野克彦报道了塔园。

7月26日，市主管领导告知塔园：不用等了，上面不会肯定塔园好坏，只是不了了之，但塔园续建工程必须缓慢进行。

10月1日，动工兴建文革博物馆前面暂时安放大铜钟的铜钟亭，继之完善

碑廊铭史设施以及修建小桥、石级通道、装石栏杆等。

10月1日，澄海诗社在塔园举行书画展开幕式。

10月17日，最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著名作家巴金逝世。在24日上海巴金先生的告别仪式上，塔园文革博物馆敬献了“巴老千古”的悼念花圈。

10月25日，凤凰台报道了塔园文革博物馆为巴金先生献花圈的新闻，评说“初步圆了巴老的遗愿”；《羊城晚报》也作了“巴老可含笑九泉了”的报道。

11月11日，汕头市党报《汕头日报》刊登汕头政府公报《汕府（2005）190号文》，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风景名胜区的通知，在介绍塔山风景名胜区时出现一句：“还有旨在教育警示后人的中国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各界人士奔走相告，以为塔园即将得到“正名”。

11月24日，《汕头日报》登了“更正说明”，宣布190号文件作废，换上193号文件为准。两个文件一对照，恰恰将“旨在教育警示后人的中国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一句删除。塔园的前途又变得晦暗不明。

11月15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逝世，塔园献上唁电，并邀请任老夫人及子女在方便时莅临塔园。

12月10日，在碑廊铭史景点前方，树立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地区专员余锡渠铜像，缅怀这位生前无私为民的好干部。由许以冠设计。

12月12日，动工兴建公路边进入整个塔园景区的大石山门。

△大型画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主编杨克林夫妇光临塔园参观游览二日，受到彭启安等塔园人的热情接待。杨克林先生高兴地浏览了天坛式博物馆以石片影雕工艺展示的大型画册全部图文。

△沈观齐等老同志为塔园文革博物馆编写讲解词、塔园导游手册稿、制录塔园宣传影碟等等。

△社会各界朋友继续给塔园寄来有关文革的书籍、赠送文革文物等。

△广州熊鉴、福建沈汇丰、四川董化民、潮州蔡瑜、香港杨文波等一大批诗书画界人士，为塔园文革博物馆写诗撰联。

△金平区委书记郭大钦动员升达公司赠送大铜钟。

△塔园又获各界人士包括澳门林俊鸣先生的捐款，泰国郭国英先生再赠款。

至本年度，海内外已有50多家媒体报道了塔园文革博物馆；海内外50多位人士来信来电撰文，赞扬塔园文革博物馆的诞生。

2006年

本年度适逢文革爆发40周年，也正是塔园建设及活动最为重要的一年。

1月，塔园召开座谈会，讨论塔园建设“是就此止步还是继续建设”，最后

形成共识：只要有条件还应继续建设。会上确定：建立塔园的核心工程——祭奠文革罹难者的安息园，即在原反思台的构思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

2月，塔山景区大山门竣工。矗立于公路道口处，向游客标识：中国首个民间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建于此景区内。

3月，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上，四十余委员联署提案《筹建文革博物馆》。塔园人为之振奋。

4月1日，安息园工程终于破土动工。排除和克服了在立项选址、迁坟赔树、台风袭扰、设计变更、资金缺口等等方面的诸多困难。

5月，塔园出版了文革博物馆资料集之一：《文革博物馆——反思文革四十年》，柯培忠编辑。

8月，塔园出版了文革博物馆资料集之二：《文化大革命纪实》，邹立生编辑。

9月28日，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汕头市委主委方展伟致信塔园首倡者彭启安，高度赞扬“创建塔园文革博物馆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全文镌刻于塔园魂广场大照壁。

10月6日，揭阳国际爱心养生基地陈小薇等僧俗信众自发到塔园举办首次法事，超度文革蒙难亡灵。塔园倡建者虽是无神论者，但尊重民间正常宗教活动。

11月26日，塔园建设领军人物、九十六岁高龄的庄明瑞老人，在彭启安的陪同下，视察了塔园和即将竣工的安息园。

12月初，塔园核心工程安息园建成。安息园广场主要有：刘少奇石像；文革酷刑石材影像围栏；文革蒙难者姓名墙；《安息园志》碑墙。

△文革蒙难者墙最初镌刻2000多罹难者姓名，以后逐年收集增加。

△安息园志碑铭文（摘）：复建安息园，使浩劫蒙难者游魂能有一处安息之地。塔园将年年于八月八日举行吊祭活动，追念告慰蒙难者在天之灵，启迪生者牢记文化大革命之殷殷史鉴。皇天后土，怀此国殇！

12月3日，举行安息园落成暨首届文革蒙难者追思礼。潮汕地区各界民众一千多人参加，由塔山景区管委会主持，会上数位塔园倡建者、老同志等发言。之后与会者参观了塔园各个景点，并举办了以反思文革为主题的诗书作品鉴赏会。

本年度主要靠澄海、潮阳、汕头电力部门等的支持，解决了建设资金。

△原广东省副省长匡吉夫妇在彭启安陪同下参观了塔园。

2007年

有好心人劝告“塔园建设到此为止”，但塔园建设者并没有退却，克服各种新的困难和阻力，使塔园建设和活动继续向前发展。

△完善安息园、思安塔、塔园魂、石笔书史、恸石志恨等景点，修建了多处环山碑廊。

△平整和扩大山地高处的石笔峰景点场地，增加 500 多平方米面积，并在此开始建设劫之结、哀鉴亭、追思坛等景点。

△塔园举办第二次大型书画展；各地又送来一批有关文革的书籍字画。

△老一代革命家李锐应邀为塔园题词“以史为鉴”，镌刻于石笔峰碑廊。

6 月，《炎黄春秋》第 6 期刊登了潮汕籍老人罗国璋回家乡参观塔园之后介绍塔园的文章《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广东阳江市党报全文转载。

8 月 8 日，安息园举行第二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各界民众一千多人参加。参加人员主要来自潮汕三市的老游击战士、各老年文化活动协会及研究会、文革死难者亲属等。公祭礼排除干扰，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以及酷暑、台风等自然条件的威胁，取得圆满成功。

本年度，塔园又募集到近百万元，确保硬件、软件建设的用资。来塔园参观旅游者更为广泛。

2008 年

1 月 31 日，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汕头市委主委方展伟致信汕头市主要领导，表达个人看法：塔园道路正确，没有违背中央《决议》，希望党政领导打消顾虑，关心和支持塔园，并希望有朝一日将塔园建设成为“具有极高历史品位，极高思想品位，极高艺术品位的文化革命博物馆”。

2 月，塔园建设委员会就方展伟先生提出的“三高”目标，向社会各界关心塔园的人士发出《塔园重新定位征求意见稿》，之后收到南北各界人士的反馈，纷纷热情赞同，并为塔园热情建言。

7 月 24 日，在汕头市莲华素食府，揭阳国际爱心养生基地僧俗信众举行“08 年超度文革蒙难亡灵法事周”，约 3000 人次参与。

8 月 8 日，安息园举行第三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为不影响民众观看奥运会电视实况，这次公祭礼采取自由组合、分别活动的形式，顺利进行。

8 月，出版了《塔园动态》第六期，本期增页，邮寄 1200 多社会人士。

本年度一批景点陆续竣工：

劫之结造型为巨大黄色长带打成的结，寓意文革劫难之根源已成为历史的死结和追思者的心结。留给人们思考该如何解结。其构思新颖，风格现代，由林军、林文设计。

哀鉴亭为传统的古建筑设计，意在不忘哀痛历史，以史为鉴。

追思坛追思彭德怀元帅的一生，以石材影雕、石坛、碑廊、碑墙等展示彭德

怀元帅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让人们在缅怀中反思。

慕贤亭意在纪念文革初期被残害的揭阳优秀女教师洪慕贤。

△增扩石笔书史、塔园魂景点；补刻各景点文字。

一年来，塔园收到各方人士若干来信，接受大批捐赠的书籍、文物。

△著名作家洪炉、教授隗芾、汕大新闻系外聘教授彼得·阿多奈特以及著名作家和凤鸣分别到塔园参观访问，受到彭启安的热情接待。

△本年度，塔园获得社会各方赠款近百万元，保证了继续建设。

2009 年

这一年是塔园出现生存危机的一年。

1 月 18 日，慕贤亭举行落成典礼。洪慕贤之子、巴西华侨黄雄先生在典礼上致辞。

3 月 1 日，文革博物馆、史鉴山屋、思安塔三景点的大门，在“不能公开身份”人士的指示下，被持续关闭，同时景区通路也被堆沙阻塞，并有陌生人监视上山游客。

3 月 28 日，彭启安会见《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一文作者罗国璋。

4 月 15 日，文革博物馆、史鉴山屋、思安塔三处景点的大门悄然打开，游客照常参观。至此三门被关闭 45 天。

8 月 8 日，安息园举行第四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彭启安在会上激情发言，就三门被关事件，呼吁人们不忘文革浩劫血的教训，奉劝手中有权的人多做善事而不要恶意摧毁塔园！

11 月 15 日，甘肃老同志吴保刚给塔园来信，希望把塔园办成“实事求是作风教育的园地”。来信全文立石于名言亭内。

△三门事件后，塔园继续建设。实施的工程有：

停建了四年的钟楼景点半截工程继续施工，并抓紧竣工，安放大钟。

新建名言亭景点竣工，安放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豪言。

增建塔园魂及安息园二处景点长廊，并增建三处碑廊。

各景点继续补刻文字，如曾经流行的若干阶级斗争用语等，以充实内涵。

与塔园相邻的一段泥土路开始动工建设为水泥路。

△《塔园动态》第七期通告塔园被关三门事件，收到社会人士大量来函，纷纷表示谴责和声援。

△塔园建设委员会资助深圳作者宋如山的《文革事典》一书出版。

本年度，社会继续有捐款：八旬体弱的离休干部王洁和女士，每年总向塔园赠款；一位不愿留名的香港人士，个人一次向塔园捐赠一百万元港币；巴西华侨

黄雄先生再向塔园捐款。

2010 年

8 月 8 日，安息园举行第五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各界民众八百多人参加。众多老同志不顾年老体衰，积极参加公祭活动。年近百岁的庄明瑞老人，由家人陪同前往。彭启安在大会上总结指出：十五年来，塔园筹资 1700 多万元，已建成 20 多处大小景点；同时面临三大危机，即政治禁区、村级管理乏力、主事人老化无接替。他寄望人们关注塔园。

8 月 8 日，揭阳爱心养生基地佛教僧俗信众在塔园做法事七天，为文革罹难者亡灵超度。

△塔园继续进行维护、补缺、完善景区各景点配套建设：维修思安塔；处理慕贤亭地面沉降；建设小会客室；修理史鉴山屋；将明镜台二、三平台改铺大路砖；为天坛式文革博物馆加强防盗装置。

△加拿大《环球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马凯先生参观访问塔园。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欧普雷博士夫妇参观访问塔园，并回国举办《文革展览会》，其中介绍了塔园文革博物馆。

△塔园又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一批诗词书画及书籍，来信均热情赞扬塔园人的精神和各项建设成果。

△宋如山编著的《文革事典》在塔园发行销售，广受读者欢迎。

△塔园将十五年来产生的资料进行大清理，为归档收藏和出书做准备。退休人员、志愿者潘可琪连续半年到塔园做有关工作。

本年度，又有一些单位和个人热情赠款支持塔园，如汕头松山电厂、华能公司、公路管理站以及泰国侨领郭国英先生等，共捐赠近百万元。

2011 年

本年，塔园文革博物馆建设十五周年，面临新的困难和危机。塔园所在村政换届后态度改变，反对和阻止塔园的建设活动，如反对举办文革蒙难者公祭礼、反对建立塔园基金会、反对在塔园举行超度文革亡灵法会等等，还拒不接受热心人士赠资建立彭德怀石雕像。

塔园倡建者在重重困难中继续努力开展活动：

△改造修整明镜台、孔教宣仁等景点，建石栏杆、铺地砖等。

△为在文革中勇于反抗而被枪杀的女英烈王佩英立碑。

△连续出版了《塔园动态》第 10 期、11 期，报道塔园活动。

△应文革罹难者亲属的申请，将“陈振夷”刻上蒙难者墙。陈振夷是抗日功

臣陈勉吾将军的后代，在文革中惨遭不幸，时年 29 岁，尚未成家。

△汕头大学研究生组织“文化之旅”，到塔园采风调查，并与彭启安合影。

8 月 8 日，安息园举行第六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暨王佩英纪念碑揭幕仪式。潮汕各地及外来民众 500 多人参加，汕头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也组队参加。塔园主要倡建者彭启安做了简短发言说明：因受到阻扰，公祭大会未能按原定方案举行；北京王佩英的儿女们未能按计划前来参加；超度文革冤魂的佛事活动也被迫易地举行。他恳请社会人士继续为维护塔园的安全存在而努力。

10 月 25 日，反文革英烈王佩英的子女张大圃、张可心一行，从北京来到安



息园举行首次家祭活动。塔园组织 200 多人帮助完成了这次活动。会后，由彭启安及志愿者陪同王佩英的子女及著名纪录片导演胡杰等一行，参观塔园各景点。

△“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向塔园赠送出版书刊的经费 42 万元。塔园回赠由画家林龙华精心绘制的王佩英肖像等。（左图：塔园安息园内的反文革英烈王佩英像碑已于 2016 年夏被有关方面派人用涂料涂抹污损碑文，后又被完全封闭。）

本年度继续有社会人士、游客及单位向塔园捐款。还有个别在职领导支持塔园建设。

2012 年

2 月 8 日，凤凰台《有报天天读》节目读了一篇文章，称有人要来拆毁塔园文革博物馆。不久又有老同志传来消息：省某领导有可能要下令拆除塔园文革博物馆。形势严峻，关心塔园的人们心急如焚。

3 月 14 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到：文革错误没有完全清除，政治改革不搞好，文化大革命可能重现。

3 月 25 日，揭阳市党报《揭阳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第一个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在党报公开报道塔园文革博物馆还是第一次。

3 月 25 日，凤凰台《有报天天读》节目读了《凤凰周刊》写的文章《不必回避对文革全面反思》，其观点鲜明，就是要反思总结文革历史教训。

5 月 10 日，《南方都市报》转载《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应该让文革史进入教科书》。

6 月，塔园出版《塔园动态》专刊，撰文评论认为：塔园曙光初现。

6月底，塔园建设首倡者彭启安忽然被市政机关党委评为优秀退休共产党员，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彭启安说：我退休后只做了建设塔园这件事，看来塔园要得到上级“正名”了。

8月8日，安息园举行第七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本地民众及外地来宾500多人参加了活动，各路记者活跃在现场，公祭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本年度继续向社会募资，以完善塔园一些景点的建设，已得到金东海公司、发能公司赠资，缓解了资金困难。

△深圳邓金城先生向塔园赠资，兴建彭德怀元帅石雕像。

△进一步完善安息园景点工程，如维修处理地面沉降问题，补刻部分文革蒙难者名字等。

△计划在资料库制作樟木大橱，妥藏资料，以防白蚁之害。

△经过两年努力，出版了大型画册《塔园十五年》，由杜绍生摄影，柯培忠编辑。同时出版《塔园动态》共12期合订本，为塔园的存在留下历史见证。

本年秋，从北京到塔园一行28人，祭奠老同学张大中的母亲、反文革的英烈王佩英。

12月18日，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等三学者到塔园参观。

2013年

4月5日，香港《明报》报道了塔园受压制的情况。

△之后国内外多个媒体记者到塔园考察，或电话采访彭启安。他们是：《博客天下》、《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汕大草根播报》、宁波《城市网络频道》及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以及美国《秦雪视频》、加拿大《环球邮报》、新华社广东分社等，以及美国哈佛大学青年学者等等。在所发表的报道中，均表示关注塔园的前景。

7月，在排除诸多阻扰、尤其在村民杜怀新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追思坛树立了彭德怀石雕像，同时在安息园为反文革的女英烈马正秀立碑。

8月6日，天问联合学会（美国）发来贺词，预祝公祭礼成功。

8月8日，安息园举行第八届文革蒙难者公祭礼。各界民众及来自北京、河北、重庆、浙江、福建等地的外地来宾共600多人参加，气氛隆重热烈。汕头数位退休及在职干部发了言，来自汕尾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彭小健也发了言。彭启安在总结发言中将文革喻为未彻底手术摘除的毒瘤，并对形势表示忧虑，提出“塔园只求存在”，希望热心人士“曲线护园”。

△网易记者、视频编辑王英杰到塔园采访并拍摄记录公祭大会。

9月8日，彭启安召开塔园研讨会，规划由潮汕地区数名塔园新老志愿者组

成小组，今后拟轮流主持文革蒙难者公祭礼，并希望志愿者能到塔园做些工作。

10月19日，中年志愿者曾庆彬开始每周末一天时间到塔园做义工，主要为游客导游，察看各景点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维修以及收集资料等等。

11月9日，彭启安到塔园，将塔园工作间钥匙、电脑设备及硬盘资料等交予曾庆彬，支持志愿者工作，并召集塔园所在村管理人员开会，就景点维修、财务、志愿者工作等，提出安排意见。

11月16日，退休人员、志愿者谢树钦参与清理书籍资料、拍摄书画等工作。

10月30日，著名学者徐友渔在彭启安的陪同下参观塔园。徐友渔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塔园能保存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他还提出一些建议。

12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主笔戎抚天及中央新影集团导演焦波一同参观塔园。他们指出：文革博物馆事业应传承下去，但目前形势确实也只有维持。建议做些基础工作，如充实史料等，等待环境改变。

12月14日，北京《法治周末》报青年记者武杰采访了塔园。

12月25日，凤凰网刊登了北京《法治周末》报记者武杰报道塔园的文章。

△塔园按计划继续完成一些景点的配套项目：如哀鉴亭增加警言碑石、完善追思坛、修复钟楼通道、复建大山门旁被车祸毁掉的碑石、维修加固思安塔楼梯、补刻蒙难者姓名到蒙难者墙（已增加到8600多名）等等。

本年度塔园继续得到社会民众包括港澳同胞的捐资。

一年来，塔园秉持“只求存在”的原则，竭力维护塔园的生存。

2014年

1月25日，塔园志愿者曾庆彬因多次周末到塔园做义工，有人向他转告，汕头有关部门要“约谈”他。

△塔园老年志愿者因主客观原因，基本未能到塔园做工作，不久即解体。

2月中旬，塔园主要倡建者彭启安以《塔园老人对塔园后事的关照》一文公告：通过学习十八大文件及纪念毛诞120周年的文章，深感现阶段塔园“正名”无望。鉴于塔园主事人老化以及公众集会恐被以“违规”名义予以“法治”处理等诸多不利因素，决定取消塔园的公祭活动。拟把塔园已建成的成果，视为历史文物保存起来，期待后人处置，并欢迎社会有识之士，到塔园参观游览，悼念文革罹难者！

△塔园取消公祭活动的决定，得到多数关心塔园人士的理解，甘肃吴保刚先生回函表示：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但愿它不要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塔园将史鉴山屋原来储藏书籍资料的杉木柜全部改换为樟木柜，以确保资料不受白蚁之害，并把已重新整理的文物资料，分别稳妥收藏。

3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宗教学专家何光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师宁女士、厦门大学教授周昌乐等学者一行到塔园参观。他们在肯定了塔园事业的同时指出：文革是全民族的痛史，沉重的历史重担怎能由一个塔园承担？

4月，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利波参观访问塔园。

5月，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萧安玲参观访问塔园。

8月6日，为履行个人诺言，彭启安提前一天到安息园向文革蒙难者行礼悼念，并安排摆放祭奠鲜花。

8月8日，潮汕地区及外地民众二十余人自发到安息园祭奠文革罹难者。

2015年

年初，彭启安与有关人士商议，拟在塔园树立新的文革祭文碑，以纪念文革结束四十周年，并邀请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为塔园撰写祭文。

4月，北京张大中先生到安息园祭奠母亲——反文革英烈王佩英，并向塔园赠款一百万元，希望维护好塔园。

4月，塔园建设首倡者、年逾八旬的彭启安决定，正式明确塔园由涂城村全面负责管理，即将塔园纳入村级塔山风景区统一管理。涂城村党政主要领导一改以往不主动介入塔园事务的态度，正式接收了塔园，并现场研究安息园景点的扩大。

6月，塔园的所有软件资料，均移交涂城村。村党政物色了一位干部主管塔园软件工作。

8月8日，彭启安与涂城村党政主要干部、塔山寺庙法师、文革罹难者亲属及一些学生等60余人到安息园悼念文革蒙难者。

9月，主管塔园的涂城村领导开始在塔园内引入佛教内容的工程。

12月31日，经克服诸多困难，在安息园成功竖立起新的文革祭文碑。石碑正面是著名学者秦晖撰写的祭文，背面镌刻方展伟的题词“历史溃痛，民族巨痛”。

本年度，仍有大陆黄志鹏和香港人士向塔园赠款。彭启安寄望，只要有社会捐款的支持，有村政领导的积极参与，塔园将会继续生存下去。

2016年

2016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也是塔园文革博物馆创建二十周年。塔园竟在这一年被实施销毁。

年初，彭启安与有关人士商议，拟在“5·16”或“8·8”即五十年前文革开展之日，在塔园举行数十人的小型文革研讨会，主题为“回顾文革50周年暨塔园文革博物馆创建20周年”。

4月初，广州某媒体青年记者三人作为游客到塔园参观，见“三门”已关，仅外景可看，参观时有人尾随。

4月中旬，彭启安向涂城村委转交一香港人士对塔园的十万元赠款。

4月27日，塔山景区公示：因景区部分景点功能调整需要，从4月30日开始将修缮建设，不便之处敬请游客谅解。

4月底，有关部门上门“慰问”老同志彭启安，通报“按上级指示，要在塔园内开展宣传活动”。彭启安表示：我年事已高，塔园已交涂城村，一切事务由村党政负责，并强调：我们老同志倡建塔园的目的是为了正视历史，提升民族精神，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4月底至5月初，塔园所有建筑，全被红色标语覆盖。有汕头人士问及村党政何故，回答是：“按上级的要求，在塔园区域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活动。区、市有关领导每日都到现场检查、督促活动布展进度。”

5月16日前后，据悉塔山戒备森严，游客受到跟踪。

（右图：安息园广场上的刘少奇塑像及王佩英、马正秀像碑等现已全部被包裹封闭。）

6月，涂城村政专管塔园工作的一干部被调离。

8月，塔园被进一步损毁：红色覆盖物被揭开，以黑白水泥、砂浆涂抹所有碑文，以铁皮包围房屋及大型碑墙、雕像等，逐步施工，全面摧毁……塔园软件资料包括大批字画、书籍等，被运出塔园，去向不明。

11月，八十五岁的彭启安老人应邀参加市党代会开、闭幕式。



编后记：



1. 本文本着客观理性的原则，根据有限的塔园文革博物馆资料、询问若干当事人以及笔者的亲见亲闻诸方面整理而成。由于塔园被毁，存放于塔园的年谱记事本已不知去向，记述难免误漏，望有识之士补正。（左图：本文作者徐小青近照。）

2. 塔园文革博物馆的创建，并未违反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中

关于文革的决议精神。二十年间，塔园接纳海内外捐资二千万余，其中捐款五万以上的单位及个人约八十位。为塔园景点设计的专家和为塔园题词赠诗撰联的各地书法诗词大家、普通民众等志愿者达一千多人。这一耗资耗时、群策群力而建成的、且已初具规模的反思文革历史基地，竟被不明不白毁于一旦，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3. 塔园文革博物馆二十年来的曲折兴衰表明，虽然早在三十多年前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就彻底否定了文革，然而事实却是：文革历史一直被掩盖、淡化、扭曲，始作俑者仍然被供奉着。近年来文革话题愈加“敏感”……如此生态环境下，民间反思和清算文革的力量势必被压制，其基地的存在亦没有保障。

4. 经历文革运动的这一代人已渐渐远去，倘若不能以“实事求是”、“科学历史观”来正视文革历史，不放下历史包袱，则文革恶性基因有可能死灰复燃！中华民族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5. 笔者近日赴塔园现场看到，所有与文革有关的石碑、塑像等，已不存在，所有与文革有关的图文已全部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的图文以及一些改头换面的奇怪造型。据现场工人讲，政府要出巨资将此打造成现代文化公园，目前还在实施中……

2017年4月8日改定